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③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 ④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⑤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⑥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⑦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⑧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⑨ 中国市场名城
- ⑩ 中国地热城
- ⑪ 中国书法名城
- ⑫ 国家园林城市
- ⑬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⑭ 国家卫生城市
- ⑮ 国家森林城市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刘振本
钱 进 尹传贵 赵 强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王庆和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高来臣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我的自传——解放战争时期 邓子恢 04

【峥嵘岁月】

在胜利曙光中诞生的华东第一保育院 艾鲁林 07

国民革命军第三三旅增援临沂之战 石绍庆 10

铁军大帐追歌行（二）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14

【名人素描】

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我的妈妈苏风
阮海贝 20

王雅量传略（上） 王如良 26

【文化掇英】

寂寞王思衍 王善鹏 32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一）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36

【探索发现】

抗战旧址之——前河湾村新四军军部 本 编 40

画说于腾（下） 高 雷 42

一则民国十年郯城县士绅的反腐告白
高 雷 王洪永 46

【蒙山沂水】

琅琊古仙传 孙启鸿 48

我的自传——解放战争时期

邓子恢



1945年8月间日本人投降，沿运河线之淮阴、淮安、宝应、高邮等城市相继解放，华中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成为包括3000多万人口的大解放区。此时中央对全国兵力部署有新的调整：将山东一一五师及新四军第三师部队调往东北，将新四军二师、七师及四师所属之九旅调往山东，华中只留一、四师部队合组华中军区，并成立华中分局，以我为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张鼎丞同志为司令，粟裕、张爱萍两同志为副司令，谭震林同志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1944年向江南浙江挺进的一师部队已主动撤回江北，以便集中力量巩固华中阵地，准备迎接国民党的新内战。

此时我及四师师部尚在淮北路西，接电后于10月间赶回淮阴。11月间华中分局与华中军区宣告成立，我们移驻淮安办公，当时即将华中地区重新区划，以原苏中地区划为第一、第二分区，苏北划为第三、第四分区，淮南划为第五、第六分区，淮北划为第七、第八分区，地方党也依次成立八个地委，只留淮南区党委管辖第五、第六地委。在行政上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同志任主席，方毅同志任副主席，下设八个专员公署。在军队编制上则将一、四师所属五个旅加上地方独立团编为一、三、四、六、九纵队，以后二师调回的五旅编为第七纵队，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同志兼司令，谭震林同志兼政委，这是当时的力量部署和组织阵容。当时我们对地方群众运动的方针，在新解放区主要是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在老解放区主要是抓紧“退租退息”运动，此时群众运动蓬勃发展。

1946年1月间，旧政协召开，谭震林同志应召飞往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后传达中央关于时局的新指示。我们当时过高估计和平局势，从而将各县的区队遣散回家，造成以后战争爆发时兵员补充的困难。4月间我和曾山同志同往延安，会见毛主席与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才知道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当即电告华中分局从思想上、军事上、群众工作上立即准备，应付新战争局面。5月间我回到淮安，即根据中央“五四指示”召开了分局及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立即在华中解放区全面进行土改。我们当时依已进行土改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贫、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对土地的没收分配是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即对中农土地不动，而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同雇农、贫农按人口平分），这个方针深得人心。但在运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干部叫喊群众运动过火，我们未为所动，仍然坚决贯彻，因此土改运动进展得很快，从6月开始到7月底，不到两个月时间即基本完成，这对华中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

当时只有七地委（原淮北地区）采取机械阶段论，将土改分为先试点而后全面铺开两个阶段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平常时期本来是正确的，但当时战争已经逼近，不允许我们慢慢来，同时淮北是个老解放区，经过了“三起三落”的“减租减息”运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可以不需要分两个阶段。七地委同志没有看到这个特点，等我们发觉纠正，已经丧失了时机。淮北战争是8月间爆发的，因而淮北土改没有完成，这也是造成以后七分区仓惶撤退的一个原因。当时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七战七捷，南路敌人进展很慢，但北路敌人强大兵力却从徐州向淮阴前进，当时我在淮北战场没有打好，西路敌军迫近淮阴，华野（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北前线来不及调回，我淮阴守备兵力薄弱，而七十四师及桂系第七军前进甚猛。为坚持淮阴，争取多一些时间便于华野后方北移，我们要求二纵队调到淮阴前线配合七纵和皮旅在淮阴城下歼灭七十四师。但由于各种原因，二纵未能及时增援，19日早晨敌七十四师主力便攻进淮城，我华野主力赶到已难以挽回战局，因此9月19日晚我便放弃两淮。此时北路与南路敌人已汇合为一，敌军比前强大，我不能再分两路应战，因此我们建议中央将山东与华中两个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粟裕、谭震林诸同志负责统一指挥，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接着涟水战役给敌七十四师以重大创伤，并在宿北战役歼敌四十九师，取得大胜。但由于敌人兵力强大继续前进，而中央又是采取诱敌深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因此1946年年底我们乃奉中央命令撤出华中战场，将主力转到山东作战，华中地区只留地方部队坚持。

我们转入山东后接连取得鲁南、鲁中三次大胜利，以后又在孟良崮全歼蒋匪主力七十四师，因此我们取得了两个月的休息机会。一方面整训补充部队，另一方面又在山东重新开展土改运动。当时山东的土改政策，对富农土地不动，地主可留比贫农多一倍的土地，这样贫农可分土地就不太多了，加上不敢放手发动农民，这就造成当时土改不彻底，群众情绪不高。在7月华东局扩大会议上检讨了这些缺点，改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重分土地，群众运动重新高涨。8月间敌人不甘失败，重新调集大军，在山东组织重点进攻，我们在7月间又打了几个消耗战。因此8月以后，黄河以南地区，除胶东少数县城外，所有县城全为敌人占领。

此时华东后方机关即转移渤海，我同张云逸同志在渤海组织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并代表华东局检查渤海土改工作。此时刘邓大军已挺进大别山，华野主力8月间退过黄河，9月间由渤海绕道转到鲁西南和豫东地区，配合二野开辟中原战场。是年底，蒋军回头西调，山东局面乃逐步展开。此时华野的兵员补充、粮款物资供应以及运输、担架等都依靠渤海，渤海人民负担很重，土改过左，群众不满，当时敌人又有从济南、天津夹攻渤海的消息，因此，我们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停止过左的土改行



1948年7月，邓子恢（左二）、陈毅（右二）、刘伯承（右一）、李达（左一）在宝丰会议上。

动，另一方面在机关部队中实行“三大方案”（缩小编制，降低待遇，并将各机关部队后方的小家当全部集中），把各机关部队后方的编余人员和节余出来的粮款物资全部供应前方，以减轻渤海人民负担。现在看来，当时那种紧急措施是巩固后方、争取前线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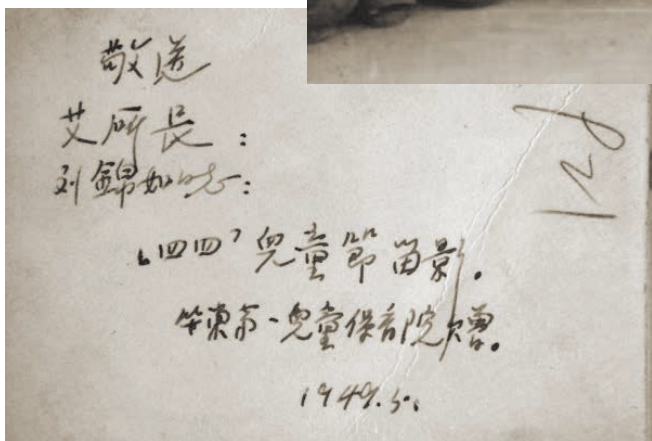
1948年，刘邓大军与华野（华东野战军）在河南配合作战，连挫敌军，洛阳、许昌相继解放，中原局面展开。中央调我到中原局工作，邓小平同志是第一书记，陈毅同志为第二书记，我为第三书记，我乃于6月间率领华东干部千余人随陈毅同志前往豫西。此时战争胜负未定，农村中土匪恶霸横行，因此农村中最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包括农民和中小商人、中小地主在内）与地主当权派的矛盾，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剿匪反霸，以求得身家性命之安全，其次才是减租减息。那时农民并不敢要求土地改革，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进行“开仓济贫”，急于分配土地，实际上农民都不敢要，这就叫做“急性土改”，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乃停止土改，改为减租减息。我到中原局时正是在这种政策改变之后，因此我们便以剿匪反霸为中心，继之以减租减息来发动群众，当时豫西群众便很快发动起来，豫东方面经过说服当时豫皖苏分局同志之后也逐渐开展起来。

1948年年底，郑州、开封解放，中原局移住开封，我们才开始研究城市工作。这些城市都是商业、手工业城市，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必须畅通城乡交流，才能使城市活跃繁荣起来。但当时我们一般同志却看不到这种规律，而盲目地取缔牙行，限制行商走贩，加上当时铁路未复，这就使当时的开封、郑州等城市陷于萧条状态。我们发觉了这种情况，便开始在开封改变这种错误政策，取消对行商走贩的限制，允许牙行复业，只取缔其垄断行为，对商店规定包税额，简化税收手续，如此开封便逐渐繁荣起来，以后推广到其他城市。在金融方面成立中州银行，发行钞票，以银元兑现，当时的中州币币值稳定。

1948年冬淮海战役开始，歼敌60万，从此长江以北便大部解放。1949年2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我第一次出席中央全会。3月间在开封召开中原地区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我当选为主席，以后二野配合三野渡江解放京沪，四野替二野从京汉线南下解放武汉，我又从二野转到四野工作。

在胜利曙光中诞生的华东第一保育院

艾鲁林



这张华东第一儿童保育院“四四儿童节”留影照片是1949年4月4日在山东青州城外大官营村照的，不久保育院迁至青州城内一教堂住了一段时间，就遵照华东局的指示迁往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49年6月20日。这张照片是保育院院长在离开山东时送给我父母的，并在照片的背面写了字，我一直珍藏到现在，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题记

战争像一头嗜血的猛兽，它扑向哪里哪里就要遭殃。战争的腥风血雨，摧毁了人们和平的生活，摧毁了温暖的家。而战争中受伤害的莫过于儿童，他们不是在战争中丧生，就是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失去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

人们诅咒战争热爱和平，然而当战争贩子挑起战争把痛苦和磨难强加在人们头上时，即使是善良的平民也要起来反抗，以便在战争中求得一条生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我们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民在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挑

起的内战又不得不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到1948年春，各解放区的军民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党中央及时发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并作出了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指示。当时，设在山东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调集军队、抽调地方干部组成干部纵队，准备南下作战。但是南下部队的孩子，南下地方干部的孩子和一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孩子怎么办？

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随同革命队伍行动的孩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同志，影响着他们的父母们革命工作。面对南下纵队干部中存在的孩子问题，华东局、华东军区的领导十分重视，他们决定筹办一个保育院，以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

于是，华东局领导张鼎丞、秘书长魏文伯、财办主任曾山、组织部长李林，分别找到山东省妇联主任刘锦如以及刚从大连回到华东局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黄海明、李静一、邓六金等几位大姐谈话：党交给你们一项光荣的任务，筹办一所保育院，安置南下干部的孩子，使他们有一个安稳的家，让他们的父母轻装出发，安心南下战斗。

1948年4月底，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第一儿童保育院”，归华东局办公厅领导，并任命李静一（魏文伯夫人）为院长，邓六金（曾山夫人）为协理员。为了就近随时接受华东局的领导和即将南下搬迁，保育院的院址选在了离华东局机关所在地闵家庄仅两里地的大官营村。

华东第一儿童保育院从1948年4月底成立，到1956年9月根据中央《关于干部子弟小学必须逐步转变为普通小学的指示》，华东保育院宣告结束，移交上海市委管理，改名为上海市委机关保育院。

华东第一儿童保育院建院八年中，先后精心抚养教育了革命后代近千人，当年保育院的孩子后来都已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之中有中央的部长、副部长，团中央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国务院各部委司局长，省、市委书记，解放军将校级军官、驻外使领馆官员、高级科研人员、大中专院校教师、工程师、医生、厂长、经理、远洋轮船长、导演、翻译、编辑、记者等等。

相关链接：

从沂蒙山走出的红色摇篮 / 李博生

1939年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徐向前率八路军第一纵队领导机关，来到山东沂蒙山区岸堤镇东辛庄。山东党组织、八路军根据毛主席指示，是要在沂蒙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来的几个领导同志，都带着孩子。徐向前夫人一边工作，一边照料着这些孩子。

房东王焕于大娘看到孩子们由于四处奔波，面黄肌瘦，心如刀绞，便向徐司令员提出，应该给孩子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徐向前同志当场表示同意，请大娘操办此事，把团以上干部随军的孩子都管起来。

王大娘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先后当过村妇救会长、副乡长，她动员、说服一批堡垒户，收留抗战将士的孩子。用分散抚养，统一管理的办法，办起了战地托儿所。首批接受27个孩子，分散在堡垒户家中，抗日政府给以津贴。后发展到41个孩子。这些孩子大的七八岁，小的还在襁褓中。王大娘全家都投入这项工作。三年后，鲁中区党委充分肯定了战地托儿所。又将45名孩子送到王大娘这里。

战地托儿所经受住了战争考验，鬼子来扫荡，老乡把将士的孩子藏到山洞里，用生命保护了这些孩子。孩子生病，王大娘找医生、找药，克服了极端的物资困难，养育了革命后代。罗荣桓、徐向前、张鼎丞、朱瑞、艾楚南、胡奇才、陈沂许多领导同志的孩子，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1948年，在山东的部队改编成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华东地区的仗越打越大，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刻到了。华东军区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做准备，成立了干部纵队，为了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中共华东局领导决定成立华东保育院，把孩子集中管理起来，使干部安心打仗和工作。这个任务交给黄海明、邓六金、李静一三位女同志。

黄海明、邓六金、李静一妈妈受命于危难之中。在离开青州市二十多里一个叫大官营的地方，找了一个地主家的院子办起了保育院。华东局任命李静一为院长，邓六金为政治协理员。华东保育院由华东局办公厅直接领导。

我之所以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一是因为它们都是为了解决山东党政军领导的孩子保育，二是因为红色摇篮有个发展过程，抗日时期，不可能集中搞保育院，只能分散在老乡家。解放战争时，解放区有了很好基础，可以集中解决孩子的保育。三是随着华东局机关的转移，1948年在东辛庄的托儿所结束了，一些孩子被父母接走，部分孩子集中转到了青州华东保育院。

从1948年成立保育院，到离开山东，保育院接收了一岁到十岁的孩子137人，陈毅、粟裕、张鼎丞、罗炳辉、曾三和三野、华东局、山东省、军区许多领导的孩子都在其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保育院共分成两部分，父母在山东工作的孩子留下成立山东保育院，大部分南下干部的孩子，决定送往上海。

到达上海的孩子，小学班35人，幼稚班32人，幼儿班20人。保育院改名为华东局机关保育院。

1951年保育院小学部改为培英小学，仍由保育院管理。1952年培英小学改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干部子弟新华小学（分总校和分校），脱离华东保育院管理。保育院的孩子由幼儿班，升幼稚班，再升新华小学分校。

1954年中共华东局撤销，保育院逐渐移交上海市管理，到1956年华东保育院、新华小学宣布结束，更名移交上海市。现在华东保育院的旧址是上海市立幼儿园。

华东保育院从1948年4月—1956年9月，教职员工达137人，培养革命者后代约1500多人。上海新华小学从1951年9月—1956年9月，教职员工有116名，培育革命者后代700余名。

这个从沂蒙山走出来的红色摇篮，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许多儿童后来走上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岗位。

国民革命军第三三三旅 增援临沂之战

石绍庆

1938年2月，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坂垣第五师团主力坂本支队及伪军刘桂堂部约2万余人，自胶济线南犯诸城、沂水、莒县，直扑临沂，以策应矶谷第十师团进攻台儿庄。2月14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庞炳勋第三军团（指挥海军陆战队）“以一部在海岸防守，以主力在临沂附近向诸城、沂水、蒙阴、费县附近游击”^[1]，火速赶往临沂坚守。

庞炳勋部虽号称一个军团，但实际上整个军团只有第四十军一个军，第四十军也仅辖第三十九师一个师。据时任第四十军参谋长的王瘦吾回忆：第四十军军部属乙种编制，直属一个特务营，一个师，即第三十九师（师长马法五）；三十九师直属两个步兵旅，即第一一五旅（旅长朱家麟）、第一一六旅（旅长李运通），一个补充团（团长李振清）和炮、工、辎、通各一营，另有骑兵一大连及手枪一个连，全军合计1.3万余人，且新兵较多，缺乏训练，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影响^[2]。

第四十军驻防临沂后，派朱家麟第一一五旅火速增援防守莒县的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刘震东。2月23日，莒县失陷，刘震东殉国。3月2日，日军第五师团片野联队进逼距临沂城仅60华里的汤头镇，临沂城岌岌可危。3月6日，李宗仁命令集结在滕县南侧的张自忠部第五十九军东移临沂附近。3月11日，第五十九军先遣一旅到达临沂北侧占领茶叶山高地，主力于3月13日到达临沂两侧，协力庞军于14日拂晓向敌反攻。激战至3月18日，最后将在临沂以北汤头镇附近负隅顽抗之敌击破，日军被迫向莒县退却。这是临沂保卫战的第一次胜利。

第一次临沂保卫战之后，张自忠部除留第一一四旅归庞炳勋部指挥协同防守临沂外，其余部队离开临沂，进驻费县沈村一带。退守莒县的敌军，在援军抵达后，配有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卷土重来，3月25日再次逼近临沂。庞炳勋再次呼援，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又奉令回援临沂。从3月25日至29日，激战甚烈，张、庞两部伤亡惨重，临沂岌岌可危。第五战区参谋长徐

祖贻致电李宗仁：庞军已基本丧失战斗力，临沂主要靠张军支撑；但张军连日激战，伤亡甚重，且极为疲惫，士气受到影响，故请速派援军^[3]。第五战区急调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缪澄流部之三三三旅及汤恩伯之骑兵团增援临沂。

第三三三旅隶属于第五十七军第一一师，军长为国民党陆军中将缪澄流，师长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常恩多（1942年玉碎沂蒙），旅长为国民党陆军少将王肇治。第57军属东北军序列，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逐步对东北军进行整编，1937年6月东北军各军根据“二二二制”整编方案开始改编，即每个军两个师，每个师两个旅，每个旅两个团。整编后，第三三三旅下辖第六六五团和第六六六团。旅长王肇治，辽宁海城人，1923年考入东北讲武堂5期步科。毕业后历任东北军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参谋长、上校参谋长、师参谋长等职。1936年参加张学良在西安创办的军官训练团，后任第五十七军第一一师六三一团团长，参加了“西安事变”。1937年1月任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副师长，东北军整编后于10月任第五十七军第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抗战期间，王肇治以沉稳果敢、善打硬仗著称，常临危受命，屡有建树。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肇治

第三三三旅增援临沂的消息传来，极大的鼓舞了坚守临沂的张、庞两部。3月28日，张自忠当即将援军即到的消息告知全军，并写给第一八〇师第二十六旅张宗衡旅长一个手令：“一、援军今夜准到，务望再撑五小时即有转机。这个时期就是最后之五分钟，我弟之能苦撑极所深知。按前几天之战事与团体有极大之功勋。这两天之经过如此之拚命，实在不能不为国家团体感佩。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二、敌人亦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最后之一秒钟，谁就能成功。三、我困难，敌之困难更大；我苦战，敌之苦处数倍于我。望率所部撑眼前这一极小之时间，甚盼，甚盼。”^[4]。3月29日，张自忠在给李宗仁电报中表示：“职军两日以来伤亡两千余人，连前此伤亡达万余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在张自忠的训勉砥砺下，全军坚持苦战。3月29日早7时，第三三三旅在旅长王肇治率领下准时到达临沂以南东高都、五寺庄一带集结，并赴前线与张自忠、庞炳勋商讨对敌策略，表示将尽全力协助临沂守军打退日军进攻。李宗仁致电蒋介石、陆军总长何应钦、国防部长徐永昌：“缪军王肇治旅本早已到，下午职赴各团训话后，即偕王旅长赴张军部。该部士气旺盛，已令十九时由东高都出发，向十里铺（临沂西北）前进，拟明早向大小岭出击”^[5]。时任五十九军参谋长张克侠在3月29日的日记记载：“晚六时，徐参谋长及王肇治旅长来此。王谓系新到任职，对部下无把握，个人当尽力而为。”

三三三旅到达临沂时，六六五团（欠1营）和六六六团共有战斗人员约2000余人，步枪1700余支，轻机枪10余挺，重机枪4挺，迫击炮5门，平射炮4门。六六五团团长沙祝华负伤未归，由团副李亚东代行指挥。六六六团团长沙为刘晋武^[7]。

当时，庞炳勋的第四十军在沂河东岸布防；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在十里铺、韦家屯、后岗头一带与敌对峙。三三三旅的战斗任务，是从四十军和五十九军阵地中间，出其不意，向盘踞在大小岭、沟上、角沂庄一带久战疲惫之敌发起突然袭击^[8]。因进攻台儿庄的濛谷支队方面的战况吃紧，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29日命令第五师团救援濛谷支队。于是，第五师团命令坂本支队，暂时中止攻击临沂，去救援濛谷支队。

坂本支队长在临沂附近留下步兵约两个大队，从29日夜开始缩小战线撤兵南下^[9]。鉴于敌情变化，三三三旅具体部署是：六六六团作为第一线攻击部队，于3月29日晚12时，进至后十里铺附近，30日拂晓攻击当面之敌；六六五团（欠1营）为第二线部队，于29日晚进至前十里铺附近，策应六六六团作战。

根据1938年4月8日第三三三旅形成的战斗详报记载^[10]，3月30日凌晨4时，大雾弥漫，六六六团一营借大雾掩护，突然发起攻击，日军不备，撤离曹家王平庄。5时，日军一队陆续攻占蒋家王平庄、小官路、毛家庄等地，进驻大岭、迫近小岭，一营英勇冲击，日军不支，撤离大岭，与日军主力会合。于此同时，日军以一部兵力抵抗一营攻击，大部兵力向二十里铺方向迂回，妄图包围我军侧面。六六六团二营于30日晨5时30分发起攻击，利用大雾掩护，逐次攻占沟上、角沂庄。2营以一个排掩护侧背，主力转向二十里铺进攻。在二十里铺东端与大岭迂回之敌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双方伤亡均达300余人。二营营长于竹幽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奋勇督战。为了支援二营，三营营长彭景文率部挺进沟上。这时在沂河东岸日军援助大岭之敌，分攻沟上和角沂庄，正在渡河时与三营遭遇，双方夹河对战，日军伤亡100余名。二营与日军主力苦战，伤亡殆尽，于竹幽营长再次负伤，壮烈殉国，角沂庄被日军攻占。一营乘日军主力迂回之机，猛攻大岭，肉搏数次，日军不支退却。一营于下午一时攻占大岭，对向二十里铺迂回之日军主力侧翼压制。这时，三营已击退渡河策应的日军，转向角沂庄进攻。

为了不失战机，王肇治旅长调上第二线部队六六五团投入战斗，六六五团二营于沟上一线配合六六六团三营进攻占领角沂庄的敌军。日军在两边夹击下实力减退，不支败退，向义堂集西北方向窜去。进攻临沂日军一部退往汤头待援，一部转往苍山向城，援助被包围于峯县、台儿庄的日军。

此战，三三三旅攻占了葛家王平庄、角沂庄等村，毙伤日军八九百人，并获战马2匹，辎重车数辆，有力支援了张、庞两部^[11]。但三三三旅也付出极大的代价，六六六团二营除副营长杜荣民和两名炊事员幸存外，营长于竹幽及全营勇士全部壮烈



东北军渡河作战

牺牲，一营也伤亡过半。

战后，五十七军通令嘉奖三三三旅：“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时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的刘斐在回忆录中说：徐州会战调三三三旅增援临沂，归张自忠指挥，于30日拂晓出敌不意实行反攻，因而取得了“张庞两军在临沂的第二次胜利”。三三三旅解临沂之围后，于4月1日奉命追击逃往向城之敌，归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指挥，在东西马甸、沟架、大顾棚等地截击由台儿庄北犯日军，浴血奋战数昼夜，毙伤日军二三百人，三三三旅伤亡数百人，六六六团一营营长林润厚阵亡，顺利掩护了第二十军团转移，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2】}。

参考资料：

- 【1】李宗仁：重新部署五战区作战任务及邓锡侯部署廿二集团军任务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
- 【2】王瘦吾：第四十军防守临沂之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徐州会战》；
- 【3】林治波，赵国章《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
- 【4】刘景岳，于麟章：第五十九军临沂抗敌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徐州会战》；
- 【5】李宗仁：李宗仁报告临沂一带战况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
- 【6】张克侠《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
- 【7】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
- 【8】吕正操、万毅、宋黎《血溅失地、功献中华—记抗日战争中的东北军》；
- 【9】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
- 【10】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
- 【11】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2次战役战斗详报《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
- 【12】李良骥《抗日战争时期的五十七军》。

铁军大帐追歌行 (二)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江西南昌——吹响集结号

(1938年1月6日——1938年4月4日)

南昌新四军军部位于原书院街高升巷新兴公馆（今南昌市西湖区象山南路三眼井友竹花园7-8号），至今保存十分完好，依旧如初。宽敞的院落，绿草如茵，林木苍翠；别致的建筑，中西合璧，风格交融。这里原为北洋军阀张勋的公馆，始建于1923年。主楼为一幢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楼上楼下对应有卷拱式外廊，四隅有六角亭。

新四军军部进驻后，一楼是军部各部门包括参谋处、组织部、宣传部、军运部的办公室，还设有临时住房作为招待所、军部食堂等。二楼为叶挺、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等军部首长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其他领导曾山、黄道等人办公、居住处。主楼右侧是一排平厢房，依次为值班室、机要室、俱乐部、警卫排。主楼左侧另有一姊妹楼，同样为中西合璧样式，规模较小，为当时新四军的临时报刊《捷报》的编辑印刷地点。

新四军军部转往皖南后，这里仍然是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所在地，直到1939年3月27日南昌沦陷前才撤走。军部旧址现为江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1938年1月6日，项英、张云逸、周子昆一行率领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进驻书院街高升巷新兴公馆。1月9日前后，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正式对外办公，并于日后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了新四军军部启事：“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太和街26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之光）处长代办。所有一切公文、信电，请径投南昌三眼井本军部为荷。”

此时的南昌，在迎候新四军军部到来的另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诗人，可谓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心潮澎湃，他就是陈毅。

陈毅，原名陈世俊，字仲弘，1901年生，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受党的委托回四川做兵运工作。1927年8月1日，在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了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陈毅没有赶上参加起义，但是在起义军南下途中，赶上了部队。此后，他与朱德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红军长征时，他被留存在苏区，以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身份，与项英带领留下的战友们打了3年艰难卓绝的游击。就在两年前的这一季节，乌云重重，寒风瑟瑟，饥寒交迫、倍受重伤加疾病折磨的陈毅，又被国民党第46师紧紧地包围于赣南大余县梅岭的深山野林中，命悬一线，前途叵测。但是他的心中却愈加坚定着革命理想，身上更加焕发着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豪迈气概，激情难捺，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写下了催人泪下、千古流芳的著名诗篇《梅岭三章》：“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困。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其一，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其二，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其三，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是何等的气节，何等的境界，何等的感人，何等的诗篇！

或许他没有想到，在他准备向世人留下这革命绝笔后仅仅两年，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



新四军领导项英(左3)、
陈毅(左4)、张云逸(左
2)在南昌

的逆转。在民族的共同敌人面前，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合法了，他陈毅绝地逢生，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山了。人之情绪最激动之时，莫过于矛盾“死结”化解之际。视为生命支撑的信仰尚未实现即为之献身，这是一般人的无奈，却是真正革命者的境界；面临绝路却峰回路转，一片柳暗忽见花明，本已抱定断头之心、绝意去“泉台”召集麾下继续斩杀敌酋，却突然真的要集合尚在的游击健儿去斩杀倭寇，这位充满诗人气质的革命家，怎么能不比常人更加激情满怀、神采飞扬？

在项英先去延安、后到武汉这段时间，由陈毅负责，在南昌设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对南方各游击区进行联络、接待等。心情急迫的陈毅，没有坐阵南昌等待，而是在项英走后，于1937年10月下旬，径自去了湘赣边界寻找游击队。本来是“春风得意马蹄急”，没料到却真的差一点闯进了“泉台”。由于湘赣游击队对外界消息一窍不通，好不容易找到了游击队的同志，一说是来召集大家接受国民党改编、合作抗日的，立即被准备坚定不移地与国民党血战到底的游击队同志们，当成了前来诈骗的“无耻叛徒”紧紧地捆绑了起来，并几经严厉审讯。陈毅哭笑不得，只得反复耐心地说明情况，并让他们去寻找证据。所幸游击队在他的提示下，终于打探到了国共合作的有关消息，他才由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宾。

项英到达南昌后，向陈毅带来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老战友、老领导的亲切问候、崇高敬意和关于南方游击队进行整编的有关指示。鉴于各游击区驻地十分分散，通信联络不畅，不少游击队对党中央新的方针政策、具体要求不知晓不明了，他们研究决定，由项英、陈毅、张云逸等几人分工划片，立即分头进山入林，向各游击区表示慰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统一部队思想，动员各游击队迅速下山集中。

这一次，陈毅被分派去了皖赣边。“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在去往游击区的道路上，陈毅反复地吟诵着自己的诗句，不由自主地不断加快着步伐。

根据分工，项英去至湘赣边，张云逸和黄道奔赴福建，曾山到闽浙赣，赖传珠前往湘鄂赣等。还在武汉的叶挺也赶到了闽西。由于有了党中央的红头文件、“尚方宝剑”，各路进展都十分顺利，所到之处都一片欢腾。

就在项英他们去到各游击区的途中，接到军部急电：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2月6日转来蒋介石的命令，限新四军于2月20日前集中于皖南歙县岩寺一带。同时，党中央也发来电令，要新四军军部尽快把部队集中起来，并且明确指示：“东南的部队可以向东开进，江北的第4支队高敬亭部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沿江游击。”

二、万余人马六千枪，光荣代号忠于党

到达南昌后，根据已经掌握的各游击队的“家底”，项英与陈毅、张云逸、周子昆等人认真仔细商讨后，于1938年1月16日，以新四军军部名义，向党中央上报了全军编制序列方案。

最初的建制方案是全军共设4个支队8个团。按照惯例，各团除了按建制序列命名外，一般还设立一个代号。在议定各团的代号时，大家动足了脑筋，费尽了心思。因为新四军这8个团，来之太不容易，是3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经历过无数劫难，付出了无数牺牲，在南方仅存的革命火种。而这些火种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了红军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本色，坚持了革命的信仰，坚持了不怕牺牲、不屈不挠的光荣传统。想到这点，大家很快形成了共识，一致决定用“保持发扬优良传统”这句话中的每一个字，依次作为新四军最初设置的8个团的代号，即“保团、持团、发团、扬团、优团、良团、传团、统团”。

项英、陈毅等人分别进山后，对各游击队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调查了解，得到了



比较准确的统计结果。于是，军部又根据新的统计情况，于2月份对原定编制方案作了局部调整，并于2月16日再次向中央作了报告。最后确定的编制方案为：

全军共设4个支队（相当于旅）、10个团、1个军部直辖特务营：

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1、2团。

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3、4团。

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5、6团。

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7、8、9团和手枪团。

新四军整编的完成，使原来分散的各自为战的大大小的红军游击队，统一编成一个完整的战斗集体。到1938年4月，全军已集中10329人，枪6200余支。而据时任军部参谋处长赖传珠的统计材料，实际上“游击队集中时约有8000人，3500余支枪，4挺轻机枪和3挺已经不能打连发的重机枪。”向上上报的数字，加上了临时新扩的战士与梭标、大刀等武器。尽管这支部队人数不多，武器装备落后，枪支多杂色，弹药尤缺乏，但指战员多是经历过南方3年游击战争磨练和考验而保存下的精英，忠诚于党，意志坚定，精神顽强，作战经验丰富，其战斗力堪称上乘。

与此同时，新四军军部领导与机构也基本建立健全。为进一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3月18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中央已于13日决定任命袁国平同志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说明：“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看得出毛泽东对袁国平评价很高，颇为信任。而叶挺和项英在大革命和中央苏区期间，与袁国平都已经相互熟知了解。党中央、毛泽东派到新四军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都是叶挺、

项英熟识和了解的人。其良苦用心，让叶、项深为感动。

此时，新四军军部已经达到50余人，内部机构也开始“成龙配套”：司令部建立参谋处、军法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秘书处，政治部建立组织部、敌工部、民运部，并开始井然有序、紧张忙碌地工作。军部人员也都穿上了崭新的新四军军装，佩戴上了新四军的臂章。臂章设计为白底蓝边，中间绘有一幅战士持枪冲锋的图案，并印有“挺进、抗敌”字样。新四军臂章虽然只有方寸之大，但它既是这支铁军的标识，也体现着广大官兵的意志与心愿。自此，根据形势的变化，新四军的臂章年年更新，直到皖南事变后，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设计并启用了“N4A”臂章，一直沿用到1945年。

在军部机关建立健全的同时，新四军兵站等军机下属单位也开始成立组建。当时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集体参加新四军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军部来到南昌时，救护队正在此城。救护队是由我地下党发展并领导的抗日救国实业组织。其中叶明进等3名中共党员在征得上海地下党的同意后，遵照周恩来同志关于“把上海煤业救护队留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工作”的指示，对大家进行了思想动员，毅然带领全队参加了新四军，一共带来25辆卡车、一批驾驶员和救护员，还有一批

药品和医疗器材。这对刚刚成立的新四军，无疑是雪中送炭。救护队从军部组建，到岩寺集中、兵站建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叶挺重返南昌城，百感交集心头生

时刻惦记着新四军整编集中的叶挺，处理完在武汉的公务后，旋即于2月11日乘火车到达南昌车站。他凝注着这座久违的城市，心头不由百感交集，波澜起伏。

1927年8月1日，叶挺作为我党发动的“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前敌总指挥，曾率领起义部队在这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血战，为我们党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时的叶挺，可以说是满怀壮志，一身雄风。在转移南下中，他先是陪同重病在身的周恩来隐藏于乡下，后又把周恩来送到香港治病，接着又杀回羊城，与张太雷、叶剑英共同组织领导了广州起义，担任红军总司令。在中国国情和敌众我寡的客观形势下，当时组织城市起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位拼上性命为党的武装斗争南征北战的战将，此后却遭到不公正待遇和错误处理，被指责为“表现消极”，受到留党查看处分。叶挺不服，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夕，按党组织的要求去到莫斯科，欲向党的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申诉。傲慢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对中国共产党这位著名功臣不予理睬，中共内著名的“左派”小人王明则在各种场合继续大肆散布所谓叶挺在广州起义中“严重失职”的流言蜚语。正直刚烈的叶挺悲愤交加，一怒之下，从莫斯科出走，从此离开了党组织。对这次出走，叶挺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对叶挺这段历史，深知内情的周恩来，后来在1944年党的会议上作《关于党的六大研究》的报告中，曾经特别指出：“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当给叶挺申冤。”

其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时已经对叶挺作了重新肯定：在抗战最紧急的关头，我党最需要军事人才的时候，任命已经不是共产党人的叶挺为两大主力部队之一的新四军军长。

今天，当叶挺以共产党的新四军军长的身份，重新回到南昌时，心中当然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感激与敬仰。虽然还没有重新加入共产党，但是这已经开始向了他“一生遗憾”的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他充满了百倍斗志与决心：当年，他在这里执行党的指示，带领部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今天，他更要在这里，带领党的这支崭新的铁军，向日本侵略者发出最猛烈的炮火！

叶挺到达军部，下车伊始，顾不得休息片刻，便立即仔细地看阅参谋人员早已给他准备好的各游击队下山集结的统计报表、情况报告、文稿地图等，了解全军目前的动态。

四、军部吹响集结号，猛虎出山啸皖南

叶挺到达南昌的次日，项英也从外地游击区赶回了军部。两人交换了近期的情况后，项英把蒋介石限新四军于2月20日前集中于皖南歙县岩寺一带的电令、中共中央要求部队尽快集中的电令，一一告知叶挺，并就此征求叶挺的意见。

叶挺高兴地说：“我在武汉时就多次找何应钦、陈诚等人交涉，要他们尽快为新四军指定集结地点，现在终于有了着落。我的意见，应立即通知在江南的第1、2、3支队向岩寺集中，江北的第4支队向皖西集中，以便整训。”

对蒋介石的命令，项英有两条明显不同意见：其一，要把8省14区的游击队在20日前集

结到皖南，根本不现实、不可能。其二，江南新四军部队全部集结于皖南岩寺一地，似乎也不妥当。但是，为了维护合作抗日的大局，加之时间紧迫，项英决定还是先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叶挺与项英两位主要领导人达成了一致意见。

于是，随着军部一声令下，激昂嘹亮、激动人心的集结号，向各游击区的部队吹响。从1938年2月开始，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如百川归海，又似猛虎下山，开始纷纷向指定的集结地集中。

新四军各部队的集结，是个艰巨复杂的任务。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南方游击区各个大大小小的山头上，距离集结地安徽岩寺，多在1000华里左右，最远的2000多华里。由于环境闭塞，不通公路，交通十分不便，加上红军游击队缺少交通工具，除少数部队能搭乘一段车、船外，多数部队只能开动两腿，徒步跋涉。而在国民党的长期严密封锁下，各游击区生活万分艰难，野菜当粮，缺油少盐，绝大多数指战员骨瘦如柴，体质十分虚弱，千里跋涉对他们无疑于万里长征。再加上没有电台等通信设备，上下联络、指挥报告，左右沟通、相互协调也极为不便，只得派人徒步联络。更加上沿途不时遭到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一些恶意思子的阻挠刁难，部队不能轻易进城入镇，只得餐风露宿，还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遭到突袭。但是，所有这些都难不住英勇的战士，都阻挡不住他们集结的步伐。他们按照军部命令，各分散的小股部队先按编制集中在一地，然后再向皖南、皖西汇集。一路之上，他们还向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社会影响。

从军部吹响集结号到5月，历经三四个月的艰难路程，分散在南方8省、40多个县、14个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向皖南、皖西集结的任务。中共东南分局在给长江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总结道：“各个游击区的部队能顺利的出动，主要是这些游击区的领导同志及全党对党中央有极大的信仰，他们对党的命令忠实地执行。”



从浙南出发向安徽歙县岩寺集中的新四军第2支队所属部队

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 ——我的妈妈苏风

阮海贝



在陪护和祭奠妈妈的过程中，在编辑悼念妈妈的书、录像片和整理妈妈遗物的工作中，以及陆续看到的有关史料中（以妈妈自撰的手写稿简历、自传、《参加革命前的家庭情况和参加革命后的主要经历》《黄毛丫头从军记》《女兵生活的片断回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工作和生活片断》《苏风同志生平》《红军女杰》等），逐渐地、越来越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树立起了妈妈苏风——一个可歌可泣的红军女杰和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行者的光辉形象。

妈妈原名陶万荣，1916年5月出生在湖北麻城市乘马岗乡（得胜寨）李家畈村老灌冲垅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母和五个兄兄弟靠租佃地主的一石二斗田和给财主打短工、做童养媳（妈妈和姐姐）、放牛、洗衣做针线活、上山砍柴甚至讨饭为生。1924年，在董必武等领导下，麻城县有了共产党组织。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黄安（现红安县）麻城两县首当其冲响应。9月，王树声（与妈妈一个村）等同志在乘马岗东岳庙建立了麻城县第一个农民协会，乘马岗区还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妈妈的父亲、姑父、哥哥、姐姐等都积极参加。1926年秋，自卫队打败了反动红枪会对破寨岗的进犯，从此破寨岗更名“得胜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妈妈的父亲他们转入了隐蔽斗争，妈妈的母亲带她和弟弟到他乡讨饭度日。

1927年秋，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妈妈的家乡又举行了“黄麻秋收暴动”。

1929年，乘马岗区实行了土地革命。妈妈的父亲、姑父在乡苏维埃工作，母亲也是妇女会会员，哥哥参加了红军，姐姐去县里做妇运工作。父亲是乡苏维埃主席，姐姐是妇女部部长。年仅13岁的妈妈也投身土地革命的洪流中，3月加入了共青团并先后担任乘马少共区委儿童团团长、麻城少共县委儿童团团长兼学联主席，在湖北麻城少共特委工作。1930年7月，她离开了与她难舍难分的母亲来到县城，在红四方面军当军委报务员、译电员，成为我军通讯兵史上最早的一批通讯兵。

1932年，鄂豫皖苏区反“四次围剿”，主力红军撤离根据地，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三光政策”。妈妈的父亲、姑父是受到敌人通缉的共产党员，在坚持对敌斗争中牺牲。哥哥在安徽独山战斗中身负重伤，红军转移后也牺牲了。也是共产党员的姐姐在“第五次围剿”中被捕入狱后被折磨致死。她的母亲则过着流落的生活，不久也死去，大弟卖给地主家当苦力，小弟给人当放牛娃。1932年10月，反“第五次围剿”后，妈妈随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入川。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的妈妈在扩大红军的工作中成绩突出，曾受过表彰。

1932年末，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解放初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通知还不到17岁的妈妈，调任新成立的红军第一支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直属妇女独立营营长（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的蔡申熙夫人曾广澜任政委，秦基伟担任军事教官）。妈妈还直接受命于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成为女红军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拿枪杆子打仗的指挥员。妇女独立营起初主要担任警卫、通讯联络、运送物资、配合清剿残匪和押看俘虏等战勤任务。但有时也有例外，在鹰龙山遭遇战中妇女独立营就曾独立歼灭了川军田颂尧左纵队一个团的残部。

1934年春，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妇女独立营被分散到各部队去，多数女兵被分配到兵工厂、工兵营、医院、工农剧团等非作战部队，妈妈调任川陕省委妇女部秘书、川陕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她还在工作之余参加省委组织的专门培训妇女干部的妇女学校学习。同年，为适应反击川军刘湘部“六路围攻”的需要，在旺苍坝又建立起辖4个营的妇女独立团，妈妈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1935年2月为策应一方面军北上，四方面军渡嘉陵江赴川西，离开了经营了2年半的川陕根据地，开始了长征。此时妇女独立团又扩编为独立师，有8000人之众。当时四方面军8万人中就有妇女1万人。这支中国最大的妇女武装随红四方面军两越雪山，三过草地。《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中说：长征中8000余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西渡嘉陵江，主要的女红军队伍有这样几支：妇女独立团（一、二团）2000人；妇女工兵营500余人（1933年10月组建，其前身是四方面军总经理部所属妇女被服厂。林月琴组建时任营长）；总政剧团（营建制，大多是女兵）；总医院700余人；川陕省委妇女学校人数不详。

1935年3月，妈妈随四方面军进行长征，担任川陕省委机关干部临时工作队队长，当年转为中共党员，这时她还不到19岁。1935年6月13日，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在夹金山下与一方面军会师。在四川懋功达维镇会师的庆功会上，妈妈登台演唱了一首胜利会师歌。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到后台看望参加演出人员时，徐向前介绍妈妈说：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黄毛丫头”，不但会唱歌，打仗也很勇敢，曾担任过妇女独立营营长。主席曾风趣地对妈妈说：叫“黄毛丫头”好嘛，你年轻会唱歌，又能打仗，这多好哇，今后我们就叫你“黄毛丫头”啰！

（《红四军的女人们（七）——红四方面军女兵团长陶万荣（苏风）》中说：1958年8月，毛泽东主席去大连，在沈阳下车。沈阳军区准备好午餐，毛主席却没有



红四方面军
妇女独立营

吃，提出要见长征路上的黄毛丫头。阮途、苏风急忙赶去看望，毛主席要求苏风再做一顿饭给他吃。阮途、苏风立即下灶忙活起来。饭后，毛主席说，这顿饭又使我回忆起长征、延安。)

1935年秋至1936年夏，时任党校俱乐部主任的妈妈（康克清时任党校党总支书记，朱德总司令也经常到党校作报告）随整编后的红军左路军两次过草地，有幸受到朱总司令和康克清的直接教导和关照。二次过草地时妈妈得了一场大病，发高烧几十天迷迷糊糊不省人事。康克清经常亲自喂汤灌药，朱总司令嘱咐“不能抬就派人背着走”。在延安期间，他们每到星期天就叫妈妈到他们住处改善生活。在帮助他们种菜园子中，妈妈学会了不少的种菜本领。他们还关心妈妈的婚姻大事，为她做牵线的红娘。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长征结束。整编后，妈妈又随红军西路军参加了悲壮的西征，郑义斋部长调她到总供给部当俱乐部主任。

1937年1月，临泽保卫战五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牺牲，总部直属队被敌人包围在临泽城内。郑义斋命令妈妈将城内几百名女同志组织起来，参加守城战斗。坚守了三天后的晚上，直属队突围赶到倪家营子与总指挥部和三十军会合。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中说：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九、三十军2万余人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军委《宁夏战役计划》并于10月10日在中央正式命令下组成西路军。经过长征的红四方面军1300多名红军女战士编为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红一方面军女红军王泉媛任团长、吴富莲任政委。除此之外，西路军供给部、医院、剧团等还有数百名女战士。妇女独立师与一方面军妇女干部的一部分组成了由王泉媛（王首道夫人）任团长的妇女抗日先锋团1300多人，也随军西征；担心违背中央命令的陈昌浩又令部队返回了倪家营子再遭马家军围攻。血战7天后部队突围至祁连山口梨园口，中央军委电告就地等待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但因西安事变国共谈判，援西军拖至3月7日才出发。妇先团团长王泉媛主动请战断后，掩护大部队转移。梨园口阻击战，她们剪掉长发，换上军装，顽强抵抗3天后覆没，成为红军唯一一支正规妇女武装的绝唱。)

1937年3月，幸存的1000多名西路军战士又浴血奋战在祁连山脉石窝山。西路军师以上干部会上作出决定：由李先念、程世才和王树声、朱良才分别率领左、右支

队主力突围转移；妈妈临危受命，负责把300余名女同志组织起来，保留妇女独立团番号，妈妈任团长，赵明英任副团长，争取突围就地打游击等待援军。不幸在5月被马步芳匪帮的骑兵围追堵截，经浴血奋战大部分牺牲，少数被俘，包括妈妈。

（《红四军的女人们（七）——红四方面军女兵团长陶万荣（苏凤）》中说：《祁连山的回声》影片的女主人公说：“我是湖北麻城人”。这位女兵团长的原型，就是麻城女红军苏凤；1937年3月4日，西路军残部突围至祁连山上的石窝，只剩下3000余人。西路军总部仓猝召开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将剩下的300余名女同志组织起来，保留妇女独立团番号，由陶万荣任团长，任务是设法突围，然后就地游击，等待援兵。王树声、朱良才靠乞讨回的延安。妇女支队大部分被俘。《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中说：进入祁连山后，仅有的300余名女战士奉命编为妇女团，由陶万荣任团长，担负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她们把好枪和子弹交给上级，几乎全凭血肉之躯引开了敌人，用手抓、脚踢和牙咬，同凶横的敌人作最后的抗争，大部分落入敌手。至此，这支在大巴山上成长起来的英勇的女红军队伍，在河西走廊结束了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

至此，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番号不复存在。这支妇女正规武装，从1933年3月在川陕根据地创建妇女独立营起，共历时四年之久，最多时发展到2000多人。在保卫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参政、参战，在长征中三过草地两过雪山，在西征时殊死战斗到底。其人数之多，历时之长，经历之艰险，牺牲之壮烈，在红军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而妈妈，不愧为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妈妈被俘后，由于叛徒的告密，同张琴秋、吴仲莲三名红军女干部作为中共要员被押往南京，关进南京反省院。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二次合作，国民党释放政治犯。1937年8月，周总理和叶剑英亲临反省院探望，走到妈妈的牢房时让身边的同志悄悄塞给她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终于找到你们了，请不要着急，很快就派人接你们出去。”第二天中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将她们三人接回办事处，并安排她们赴延安事宜。1937年11月妈妈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的李富春、蔡畅安排张琴秋和吴仲莲去中央党校学习，妈妈则分到陕北公学担任女生队队长。1938年春，妈妈作为延安被选中派往苏联学飞行员的唯一女干部，尽管她很想去但还是服从组织分配，罗瑞卿派她到抗大组建第一个女生队当队长（吕璞为政委）。这是一个军事队，下设三个区队，隶属苏振华为大队长的抗大第一大队。它还作为礼宾队迎宾，拍的电影还在苏联放过。这年秋，抗大的各大队也都相继成立了女生队，其队长、指导员以及区队长，大多是妈妈这个队出去的。妈妈继续带了两个女生队后，又在1938年秋抗大成立的女生第八大队任副队长（张琴秋任大队长）。

（妈妈去世后为出《红军女杰》一书，我和五弟采访当时四方面军尚存的元老，曾在洪学智上将家听他说：以前他到大连曾打听过陶万荣，但没人知道。陶万荣曾在延安抗大刘忠任大队长的四大队一支队分管女生队，记得当时女同志正在洗澡，遇敌机轰炸来不急穿衣服就往外跑；

抗战胜利后，妈妈在南满军区工作期间，时任中央妇委书记兼东北局妇委书记的蔡畅还给妈妈写了封信，希望她继续关心妇女事业。1957年，妈妈在北京政法干校学习时遇到蔡畅。她拉着妈妈的手说，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很重要，希望你能在政法战线上为革命培养出更多的女干部来。）

在延安抗大，担任女生队长的妈妈巾帼不让须眉。原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苏振华将军说：当年在抗大，妈妈的射击、骑马技术超过了许多男教官；与她赛马许多男同志包括他自己都只能跟着她的马屁股跑。原成都军区政委余洪远将军称妈妈

名人素描

是“红军中的花木兰、穆桂英”，他说：妈妈年轻时挎双枪、骑快马、身材挺拔、嗓音洪亮，演兵场上振臂一挥不仅女兵响应，四下里也不知倾倒多少男儿。原国防部部长秦基伟将军说：当年在红四方面军妈妈是有名的“假小子”，他在给妇女独立营当教官时就亲身领教过“假小子”的厉害。那时搞攻防训练或抢占山头演习，往往是他与妈妈各带一半人马，大多是妈妈带的队伍占上风。还有一位妈妈的老战友说：妈妈是红军第一支妇女正规武装的营长，又是延安抗大第一任女生队队长，这两个“第一任”了不起呀！党给妈妈的评价：“威振敌胆的红军女战士和指挥员”。

1939年6月至1940年10月，妈妈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12月，已怀有身孕的妈妈坚决要求到敌后参加游击战，经朱总司令向李富春和蔡畅“说情”，被派往山东抗日前线，历任山东纵队司令部政治协理员（在政治部青年学校任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山东军区保卫部政治协理员（在为敌后派遣工作做掩护的大鸡烟厂工作，认识了后来成为我父亲的阮途）。

在赴山东前线途中，经湖西地区妈妈生下了大哥。为适应战时需要，她忍痛割爱把大哥托付给当地老乡亲家代管。之后，在反扫荡战斗中，妈妈的爱人、时任山东分局书记黎玉秘书兼作战部长的牟子芳，在对崮峪遭遇战中为保护黎玉而英勇牺牲。离别了出生不久的孩子，又痛失了爱人的妈妈，在对崮峪战斗后毅然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解放战争期间，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妈妈调到一一五师，随部队解放东北（同罗荣桓政委一道）。这时她才将大哥接回身边，与二哥一起随军征战，既是战斗员又要承担两个孩子母亲的责任。

（《红四军的女人们（七）——红四方面军女兵团长陶万荣（苏风）》中说：1945年9月，山东军区司令部奉命进驻东北，阮、苏夫妇却为两个孩子没有御寒棉衣发愁。许世友听说后，立即派人送来两件小孩皮大衣，解了燃眉之急。）

她历任东北南满军区直属队副科长兼党总支书记（与肖华将军共事）、政治部保卫部科长、南满分局妇委会委员、辽宁省公安处科长、辽北省公安处人事科长兼党总支书记。

建国后，妈妈历任辽西省公安厅科长、处长、副厅长（1949年冬至1952年



苏风与林月琴（右）

春)，沈阳国营一一二厂副厂长兼保卫处长（1952年春至1953年春），东北公安总局处长，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省妇联委员。

1958年冬，反右倾运动中父亲遭诬陷。妈妈因实事求是、坚持正义而受牵连，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妈妈和爸爸对我们说，他们是冤枉的，一定要向上申诉直至党中央。告诫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妈妈送爸爸去铁岭种畜场劳动改造，自己拖着已是肺气肿和风湿痛缠身的病体到省政府机关花窖参加劳动，并承担有七个子女的大家庭的家务重担。

1963年秋，经朱德、康克清、董必武、罗荣桓、罗瑞卿等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由中央监委指名复查，否定了对妈妈的原结论，恢复党籍，分配到辽宁工业展览馆任馆长。可好景不长，1966年夏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妈妈备受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对爸爸平反后，妈妈才得到了彻底平反。1977年夏至1982年秋，妈妈先后任旅大市卫生局副局长，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中共大连市纪委委员，大连市第八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连市政协常委、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委员，大连市妇联委员，辽宁省妇联委员，全国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主席团成员等职。获得新生后，她居功不傲，严格要求自己 and 家属子女，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被誉为廉政的楷模。

1982年5月，妈妈主动退出领导岗位离休。离休后，她仍然以常人少有的热心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力所能及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就是在病情危重，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依然与病魔奋力抗争、关心他人和继续着为党和国家的未尽事宜。党给妈妈的评价：“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尚风格和高风亮节”，她当之无愧。

妈妈去世后，为出《红军女杰》一书，我和五弟去谢觉哉家，看望其夫人王定国。她欣然命笔，代表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和肖华夫人王新兰等四位妈妈，写了“长征老战友，红军女英雄”的题词。她说：“你妈妈不是一般的红军女战士，是女杰，是女红军中真正拿枪杆子打仗的，这样的人不多！”曾是妈妈在抗大学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为妈妈题词：“红军女杰”。

妈妈生前几乎很少对我们讲她曾经辉煌的革命史，就是在她晚年病越来越重期间，按她自己的话说：“是在有关方面的催促下，写了一点片断的历史回顾”。她在病危抢救期间，在半昏迷中曾断断续续向我们讲过很多心里话，其中有：“转告组织，将我苏风这个名字改过来，这个名字是骗敌人的。我叫陶万荣，我的父亲叫陶绪福。国民党四次围剿，我那时15岁，拿着大刀、小枪和他们拼。我13岁就开始跟党走，以后跟红军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我有个愿望，想写个大事记。我在抗大培养的学生曾战斗在全国各个战线，他们都不知道我苏风这个名字，真后悔当时改了名字。

她的遗物中有这样一段手写的感人肺腑的话：“回顾这几十年，我想我们这些人没有虚度年华。我们过了几十年战斗的生活、豪迈的生活，也可以讲是辉煌的生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岗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做出了能够和应该做出的贡献。我没有什么后悔，也没有什么惭愧。我们对得起历史，也对得起将来。”

王雅量传略(上)

王如良



王雅量（1566—1633年），字有容，号左海，山东费县人，明万历二十二年举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任山西阳城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广西道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等职，官终光禄寺卿。

王雅量的家族，以世代书香而自居。早在明朝洪武初年，始祖王桓以贤良征为费县儒学训导，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王桓有二子，长子景泰永乐年间任大名府知府。次子景阳继承父业。到三代王普、王缙均以岁贡起家任通州吏目。此后世代读书，进取功名。王雅量的父亲王慎为第九代，自幼入庠攻读，痴迷经史，在学三十余载恒久不辍，造诣益深，后荐推淄川县儒学训导，教书育人。任职期间，勤于职责。所得俸银，多将抚恤贫生，对诸生不能婚葬者，常倾囊相助。后擢升天长县教

谕，诸生洒泪相送，百余里乃归。县学同僚为彰其品德，立石以志，永垂后人。

王雅量自幼受到父亲的启蒙教育，呀呀学语时，父亲王慎还在为自己的仕途苦读。孩童的模仿力应是极强的，他学大人们读书写字。王慎偶尔教他几句，他都能认真背诵，牢牢记住。王慎见到儿子聪颖善学，就每天教他诵读一段《百家姓》或《三字经》等诗文。王雅量过目不忘，很得父亲的赏识。王雅量七岁时，被送到儒学就读，他一直学习很用功，在同龄伙伴们当中，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节假日，父亲王慎经常带他和文人一起切磋文章。王雅量虽然听不大懂，但还是记诵了不少。明万历五年（1577年），县学组织“柏梁体”联对比赛，12岁的王雅量初露锋芒。他思路敏捷，应对得当。费县教谕施佰祚看他小小的年纪竟能出口成章，料想他将来必定有些出息，便商议王慎保举他到国子监学习。对于施佰祚的提议，王慎当然求之不得，可他怜惜王雅量年纪尚小，生活不能自理，便婉言谢绝了。到万历八年（1580年），15岁的王雅量参加童子试，三场下来都是第一名，因而获得秀才资格。

生员宋日乾（向城人）慕王雅量文才出众，专程造访，二人相遇，言谈默契，情投意和。论及年龄，宋日乾年长王雅量七岁，当为兄长，二人称兄道弟，遂成挚交。文人相识，多以文学方面交谈，为共同促进学业，他们一起缔结文社、古文词社、诗赋社，这些文化团体促进了他们渊博的文学造诣。

按当时县学生员的要求，专攻一经则已，然而，凡四书五经涉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之书目都要系统的学习。自我国从隋朝兴起的科举制度，试卷的命题必须出自这些书目。为此，在封建社会，这都是士大夫谋求官职和确立政治地位的钦定教科书。然而，这些书内容繁多，涉及面极为广泛，要想真正熟练的掌握它也确实是有困难的。万历十六年，王慎以淄川训导的资质考授天长县（今安徽省境内）教谕。上任途经故土，便道省亲，当见到儿子未入仕途，便投檄不赴。自此，在家耕田教子，清居乡里。

万历二十二年（1595年）王雅量乡试夺魁。在拟定解元时，主考官发生了争执，一时难决。时钦差使臣山东提督学政连标，提议置王雅量为第三名，其闱墨被刊印发行，以示众生。其经纶理义，脍炙人口。多年的高窗寒暑，换来了金榜题名的无限喜悦。

王雅量考中举人后，便与同科到布政司去拜谒邵公。邵公对他说：“我保举你们仕进成才，为国家效力，也不枉皇上对我的尺寸之用。你等将来对国家有所贡献，也是我保举的荣施。否则，若博得一及第之荣耀，而去温饱自肥，将辜负我的一片诚意，也辜负你圣贤门第的声誉了。”王雅量谢过邵公的赐教，不久，回归故里向父母报喜。县尹吴从礼率众胥吏亲来道贺，谈话间吴公问及邵公之意，王雅量从实相告，吴公大悦，并致谢邵公关怀之情。

王雅量乡试中举，奠定了他步入仕途的基础。万历三十二年（1605年）春闱，王雅量三篇文章获取贡士，到三月十五殿试策问，中甲辰三甲，黄榜有名，赐同进士出身。京城侯旨，得官阳城县令。京城逗留期间，同学年友，相互祝贺，攀谈谒见数月有余。仪礼致毕，到吏部办理了阳城任职的檄文。上任途中便道省亲，自然达官贵族，街坊邻居前来祝贺，迎来送往，互相邀请，议古论今，吟诗联对，好不快乐，转眼间，新春已至，王雅量欲拜别父老乡亲，远程山西上任。临行，父亲王慎将他唤到跟前，就历代为官之道，诸如：“史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又“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廉生公，公生明，明生断”等铭言讲与他听，王雅量一一记。

二

万历三十三年初春，王雅量拜别父母、妻儿及乡里亲朋，择吉日阳城赴任。一路只仆人张义结伴同行，惟图书半肩，行囊简易。二人夜宿晓行，水旱交替，渡黄河，攀太行，历尽艰辛，十数日方来到阳城地界。

王雅量上任伊始，遵循父亲的教诲，以怀德为心，务使百姓得到实惠。初时两税逋欠，豪户富人多勾结猾吏篡名下户，以致上缴的税款与贫民均摊，每年的正供未完，而贫户已力竭了。王雅量知其弊后，亲检税籍，对输纳不时者严惩不贷。并设置䟽筒之法，听任民众匿名举报，由此，奸弊绝，民乃得苏。由于阳城已近两年缺少印官，积案叠磊，民怨四起。王雅量善理时政，从速将积案一一清理，让人心服。

阳城地处山区，十年九旱，人们只有靠天吃饭。万历三十五年阳城发生了严重旱灾，农民春播困难，夏秋颗粒不收。王雅量慨然奏请皇上，挪用库银，购粮救济饥民；并捐出自己的薪俸，开设粥铺，接济流民。同时倡导富裕之家，开仓借贷。因而，使大灾之年没有发生饥民流亡现象，百姓深感得到实惠，感叹说：“若往年，逢此灾害，不知要多少人枕籍沟壑，背井离乡啊！”

王雅量在任期间，一日发生一命案，当地人怀疑是一无赖所为，随拘禁到官定罪。后来在审理另一案件时，案犯自认有杀人事，且与前项吻合。王雅量方知上案错判，自愧办案粗心，差点酿成大错。遂向胥吏说要翻案之事，胥吏竭力反对说：“案件已结，又报当道定罪，如再自行翻案，恐对大人不利，万万不可。”王雅量叹息道：“为民之父母官，当于民做主，吾岂能为己之官声，而草菅人命呢！”遂上报将真凶抵法，无赖释放。事后，与王雅量同科考中进士的王象晋曾撰《王廷尉平反传》评其事。说王雅量不计较个人得失，知错必改，难能可贵，应受到世人的赞誉。

与阳城毗邻的沁水县缺少县令已久，上司决定让王雅量代为管理。他以三月为期，治理沁水，合理调配均徭，无误春种秋收，受到甲里好评。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是王雅量治理阳城的第四个年头。一个地处僻壤的山城，经几年的治理，井井有条。矿产开发，手工业的发展，使阳城的工商业蒸蒸日上。时年外官考绩，泽州太守的评语是：“仁明闻佐归心，廉威豪右敛迹”。

王雅量一生嗜好读书，他对别人也是如此要求。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是阳城县教育事业最鼎盛的一年。这年在山西布政司组织的乡试中，考生夺得了五经之首，中举者众多，成绩优异。这证实了王雅量重教的结果。在阳城任职期间，王雅量除忙于政务外，再就是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当暇余就到学宫去辅导诸生的功课。还常拿自己的薪俸给诸生购书，以此鼓舞生员的学习热情。那些家庭贫寒的学生得到的资助最多。当时有一位吴姓生员，因家贫不能完婚，时常叹息，王公知情后，出资帮他操办婚事，劝其振作精神，用功读书。生员张慎言（1577—1645年），字金铭，号藐姑，屯城人。是河南参政张升之孙，张慎言虽出身显赫，可他从小死去了父母，靠祖母抚养成人。慎言幼小聪慧，远见卓识，学业上也有所造就。但由于情绪低落，屡荐不中，致使学习懈怠，不求进步。王雅量初次巡视学宫时，偶尔发现慎言写的一手好字，就找慎言谈论近年来科举的情况，慎言心灰意冷地说：“想平常也满腹经纶，可入闈确难以发挥。”王雅量听后就耐心的指导他。自此以后，慎言发愤苦读，果然在万历三十七年中已酉（1609年）科举人，五经夺

魁，荣获头名解元，又在次年春试，中庚戌（1610）进士。张云鹏也是王雅量的得意弟子，与慎言同年中举，后于万历丙辰（1616年）中进士，官至督察院右监督御史。杨时化，万历己未（1619年）进士，官至左给事中。王征俊，天启丁丑（1625年）进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石凤台，天启丁丑（1625年）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王雅量以自己的才华，培育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上述这五位进士，皆是王雅量的得意门生，后来成了他官场的同僚。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王雅量阳城任满，擢升御史，调入京城。消息传出，无论贫富尊贵，妇孺黄童，皆夹道相送。有受王公实惠者，更是恋恋不舍，分离之情难以言表。后来阳城人张时道、王三征等数十百人请退隐乡宦白所知为其撰写碑文，以怀念其恩惠，并立生祠，以志永世。

王雅量在离开阳城二十多年后，闻之阳城百姓仍思念与他，即挥笔赋诗一首：

回首行山梦一场，飞鸿几度意何长。

犹恋父老牵袂泪，更入公卿华袞章。

自愧劳心输卓茂，敢期遗爱系桐乡。

邑人若问吾何状，依旧愁眉鬓又霜。

信至阳城，邑民如获至宝，将诗文刻于石上，砌于壁间。

王雅量在阳城做出了成绩，万历皇帝降旨封赠了他的父母。

三

万历四十三年春，王雅量为父亲守孝届满，便携母亲以及妻子赴京候旨，月余，接到巡抚辽东的圣旨。辽东地区自万历十一年始，明廷与建州卫女真族人就产生了摩擦，以致局势日益恶化。明廷对东北地区实行的以夷治夷，边民自治的政策也不太灵验了。王雅量领此圣意，也是吉凶未卜，在朝的同僚以及同乡既庆幸朝廷委以重任，也都为入住辽东而感到担心。这时王雅量也是左右为难，一边是年迈的母亲还能否见面，一边是朝廷正用人之际，忠与孝的权衡当在一念之下。四月初遂将母亲妻儿安排回乡，自己也随即动身，十八日便赶到辽东重镇——辽阳城。

王雅量上任后，首先挑选精壮勇士充实各卫、堡军营，裁减军营中的老弱残疾官兵，并亲自督造先进兵器，整饬军队，严肃军纪，选配调整了一批官员。

首先，辽东总兵为军事统帅，这一职位至关重要。在王雅量到职前一个月，原总兵张承胤因病去职，由李怀信接任此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九月，王雅量见李怀信不能胜任此职便上奏罢免，选王柎为总兵。十月，王柎因军事指挥失误，给予其“戴罪处分”，参将李怀忠也受到“下台讯”处分，同时新选李维功为辽东总兵、都督佥事。

在王雅量上任之前的万历四十三年元月，辽东参将祖天寿因出猎曹庄，致使女真蟒金等酋入犯，杀掳我边民650余人，官军丧失士卒220余人。王雅量将此事上报朝廷兵部议处。以此为鉴，告诫边民以及边境将士勿越过边墙，免生是非。

辽东军备统一整饬后，努尔哈赤多次寻衅进犯大都被阻止。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努尔哈赤为求娶北关老女（东哥）一事，屯兵3000于南关，但惧明廷抚顺、清河官军之犄其后，不敢轻举妄动。此间王雅量上“题辽东灾异”“题北关嫁女招衅”等疏。及时反映建州女真的动向。

万历四十三年仲秋时节，王公按照朝廷的规定，巡视辽东各地，考察官吏政绩。抵达开元（今辽宁省开原市）时，女真各部落都派使者、翻译前来汇报。王雅量向女真各部传达了皇上对边疆民族的信任及恩典，详细讲述了维护朝廷与背叛朝

名人素描

廷的利害关系。他讲的道理明白透彻，言辞恳切生动，听者都非常感动与钦佩。有个别部落首领表示要放下武器，归耕于田园。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使者把这些年来对明朝的怨恨、女真族各部之间的恩怨，愤怒地向王雅量诉说，言辞极其刻薄。王雅量对其使者说：“努尔哈赤乃国家的优秀栋梁之材，他若能顺服朝廷，才是他让人佩服的先见之明！”从此努尔哈赤与明朝和好，每岁输送方物，明廷亦岁给银以及蟒缎等类，并许彼此人民在抚顺互市。

王雅量巡视完毕，即给朝廷上疏汇报：“建州卫努尔哈赤既吞南关（辉发部），无日不图北关（叶赫部）也，惧吾之涉其地，是以返地立碑，窥衅乘隙。借口老女，今老女嫁矣，我不能阻老女，又安能阻夷酋耶？”为此，他又分析说：“今欲加兵建州，必曰立碑纳款，吾未尝贰。而北关改嫁吾聘女，如何罪我。缓急之间，似宜酌计，宜战毋退，宜守毋进。”朝廷采纳了此建议。

王雅量在给朝廷上疏，提出对努尔哈赤斗争策略的同时，吸取前任的经验教训，严格管束边关将吏，使努尔哈赤找不到大举进攻明军的口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建州女真人。

万历四十四年，明廷与建州女真划地立碑互不进犯，辽东暂时处于平安状态。但是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今新宾县）建立后金后，仍然向明廷通关纳款。历史上对这个时期的记述不多。据朝鲜的一些资料中记述，“奴酋因灾荒原因无力出兵，此间停战是养精蓄锐”。可想奴酋是以抢掠起家，此结论也未必完全正确的。不过王雅量在处理辽东动荡的局势时，也确实有他独到的军事策略。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是王雅量巡按辽东的第三个年头。按照当时朝廷



王雅量芳林苑奇石——青莲朵

的规定，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巡按大臣应于每年的瓜熟季节予以更换，可是由于辽东战事紧张，形势危殆，官员们都不愿意或不敢去，朝廷派不出新的辽东巡按，于是王公只好连任三年，直到万历四十五年，新任辽东巡按上任，王雅量才获准回原籍探亲。但他刚到家不久，即接到要他巡按陕西的旨令，于是，他又急匆匆奔赴陕西。

王雅量身在陕西，仍密切关注着辽东的形势。后金奴隶制政权建立后，努尔哈赤见明朝内政日趋腐败，军事防御日渐松弛，即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并积极作攻明的准备。王雅量通过给皇帝上疏的形式，坦陈辽东战局的利害关系，建议朝廷继续实施积极的军事、政治斗争策略，以挽救日益危急的战局。

王雅量在给皇上的疏中说：“后金人猖狂肆虐，出没时间不可预测。从表面现象上看，他们或隐于巢穴，或解甲息马，可是有谁能知道他们会不会突然发兵进攻我朝，而且迅疾得像一阵狂风暴雨。辽东以南地区虽有半数归顺我朝，可安知他们不暗中与后金勾结。现在他们是假装愚蠢，以窥时机。辽东土蛮人与后金虽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们能与我军共守国土、会无二心吗？”

王雅量在这次上疏中再次精辟分析了辽东局势，阐明后金必定要向明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日本也虎视眈眈，要进犯我国，而我东北兵力薄弱，援辽军又是仓促集结，边防将领不断投降后金，当地土蛮人也靠不住，战局发展对我十分不利，朝廷应切实加强辽东及我国东部沿海边防，尤其要防备后金即将发起的进攻。遗憾的是王雅量的这些重要建议未被朝廷重视和采纳。

后来形势的发展，完全如王雅量所分析和预料的那样，后金突然进攻明朝，明军由于准备不足，指挥失误，一败再败，致使东北地区全部被后金攻占。

王雅量抚辽三年，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及时向朝廷提出了许多带有预测性的战略性意见，整顿吏治，严明军法，整饬军纪，加强军备，使边防力量大大增强，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努尔哈赤的挑衅，并且正确地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惩治违反双方誓约的官员，按抚了女真部落，延迟了努尔哈赤侵犯明朝的时间，对稳定当时的东北局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更正

2016年第一期《姓氏百家漫谈——徐姓》一文中，“徐祗琦上世纪八十年代任郟城县副县长”应为“任郟城县县长”。特此更正。

寂寞王思衍

王善鹏



王思衍进士第已是人去物非，只有门前的那一尊石狮，还默默地在旧址旁守候着

兰陵最后的一位进士公，是被慈禧太后称为“铁笔”的王思衍先生，他在京城做了十年的吏部主事之后，对官场的污浊之气渐生倦意，便有了“寄语故园两三树，少留春色待余归”的念想。最终，王思衍于宣统二年（1910年），辞官回到家乡。

衍公一路回乡的心情是复杂的。官至吏部主事的他，回乡做起了白丁布衣，如何面对家乡的父老？回乡似乎又是他唯一的选择，官场的暗无天日，叫他痛心疾首，万念俱灰。既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只能选择急流勇退了。

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衍公第一次弃官返乡。十年前的庚子之乱，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入，举朝溃败，仓皇而逃，衍公不屑于朝廷的龌龊之举，未随驾西窜，而是回到了故乡兰陵。1901年9月，清政府一一给列强们赔了银子，八国联军才

退了兵。这时候，北京已是满目疮夷，宫廷里的匾额散落一地。谁来修补这些匾额呢，慈禧太后便想起了“山东东南乡铁笔王思衍”，衍公才有了二次进京的经历。

衍公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兰陵镇插柳口村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及第进士。凭其才学，衍公本是一甲的功名，因慈禧观其字体，得出“此人笔力遒劲，必定抗上”的判断，只得了“三甲第一”的名位。

衍公在吏部任职十年，耳闻目睹了官场的丑陋百态。“但有金钱会，无忧顶戴赊”。只要肯花钱，就有的官做。面对一派浑浊的朝廷，衍公枉有拳拳之忠，更辜负了寒窗之苦。他怎么不牢骚满腹呢，既然报国无门，当年何必雪天萤席，又何必宵旰攻苦？

叫衍公困惑的还不止是这些，他在《诗存》中说，官场内明目张胆地行贿受贿，达到瞠目结舌的地步。“冬日炭敬，夏日冰敬”，“朝贵索函于外，银万两代购端砚一方或曰‘四书’一部，至诗为三百，礼为三千，名目綦繁，大抵揣事轻重，得其大小之数，意会以应之。”更有甚者，同僚竟教唆衍公去花钱买官，他也亲眼目睹“某某白丁已庙堂，某某后我转超躐”。

当一个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在瞬间化成灰烬之后，他信仰的高楼大厦便轰然倒塌。这时候，要么随波逐流，要么大彻大悟。衍公属于后者。

二

兰陵镇城西的插柳口村，以插柳成荫而得名，它南依小郭山（温岭），西临涛沟河，北靠郯峰古道。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每年夏天，这里花开满园，柳絮飘飘。衍公的进士第便藏于这“梨桃百树柳千畦”的景致里。进士第门前是开阔的广场，广场前边有一处水塘，村人称“元宝汪”，“元宝汪”岸边柳枝婆娑，与进士第遥相呼应，一派文雅之气自然而生。

进士第威武高大，设计考究，青砖黑瓦，雕梁画栋，整个布局彰显了文化气氛。主房名曰“拙笑轩”，书房取名“木石居”，书香之气浓郁，整个建筑温馨祥和，朴实谦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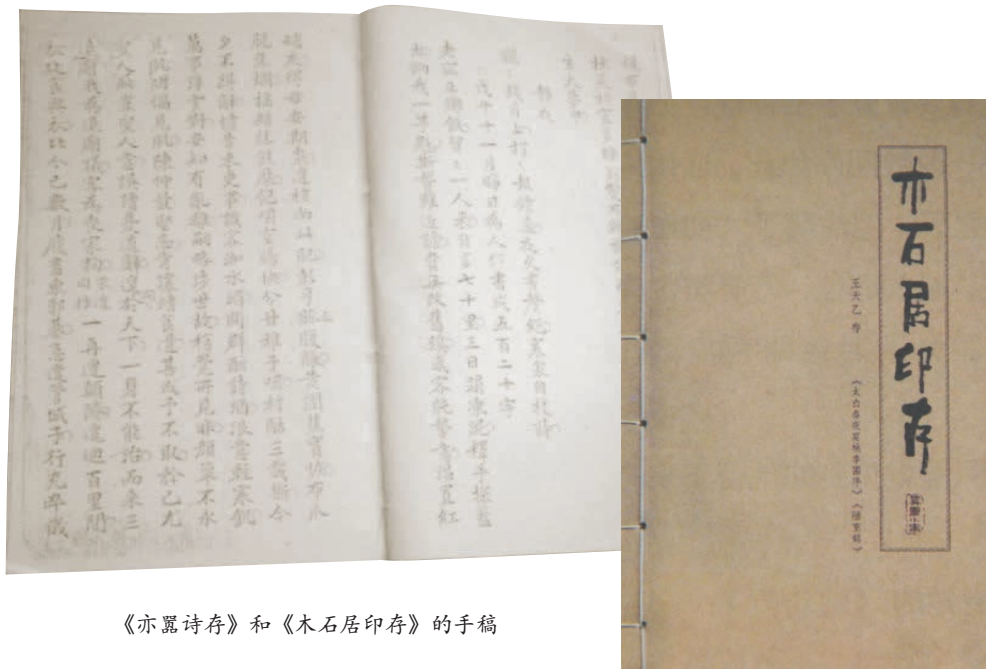
衍公给自己的主房取名“拙笑轩”，一定有其深刻的蕴意。衍公笑什么呢？笑英雄无用武之地，还是笑这个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

衍公倾情于家乡的垂柳，以至于他的大半生，都是在“柳条垂碧麦苗青，淡淡轻荫落满庭”的景象中度过的。自从辞官返乡之后，衍公远离红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属于他的笔墨丹青的世界。

1910年至1920年，可谓衍公创作的黄金十年，在这一时期，衍公九易其稿，写成了《老子盲说》和《文字盲说》。这两部作品是衍公的呕心之作，他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对老子思想的深刻领会，对《老子》作了详尽的注解，其中释义多有独到之见解。在《文字盲说》一书中，他摘出一部分汉字来讨论、注解，并多有发挥，是衍公一生学问的结晶。

流传于世的《亦器诗存》手稿，收录了衍公的大部分诗作。在诗词创作中，衍公擅长叙事说理，抒情偏少，以所见所闻所感，抒发内心的爱憎，从中可窥视衍公洁身自好，不与世俗权贵同流合污的思想和主张，也为研究近代史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衍公的书法博取米、王、颜、赵，篆刻宗秦玺汉印，并集众家之长，融会创新，自成一格。《木石居印存》收集了八十一枚印章，用毛笔作注，给人以淳朴浑



《亦器诗存》和《木石居印存》的手稿

厚、雅致精妙之感。

可惜的是，衍公的作品留世不多，他回乡后的岁月，多是在军阀混战、匪乱荒灾中度过的，其著作均未出版，只有他的极少几位学生，有幸拜读过手抄本。连衍公的公子，那位被称为“疯爷”的王意和，也未曾收藏一册一稿，也许是衍公对儿子放荡不羁的性格放心不下吧。

好在衍公的每一份手抄本并非一本，均委托好友或得意门徒各自收藏。1979年，在衍公好友王天一之孙王建东家里，发现了《亦器诗存》下册和《木石居印存》的手稿；著名学者王毓玖先生存有《文字盲说》的手稿，对后来研究衍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三

“种瓜初劳土，种菊待编篱”。衍公的田园生活是惬意又充实的。白天教“一儿一侄一甥读”，晚间则“夜久书声绝，寒衾自校诗”。

兰陵多学底，兰陵自古就是书声琅琅的地方，衍公的进士第更不例外。

民国初年，教育革新，新式学堂应运而生。兰陵的莘莘学子，均以临摹衍公的字帖为荣。在兰陵，不临摹衍公的字帖，被视为“另类”。于是，街坊邻居纷纷向衍公求字，然后带回家去，给学生当作字帖。字帖用久了，字迹模糊不清了，没关系，再向衍公索要。为了孩子的学习，衍公是从不惜墨的。

有时候，登门求字者应接不暇，衍公有原则，对布衣百姓是从不敷衍的，无论相识与否，只要张口，便有求必应。这一时期，是兰陵盛产书法家的时代，人人写得一手好字。后来，好多人走出兰陵，成为知名的书法大家。

衍公也有累的时候，面对排队索要字帖的乡邻，也曾笑谈：

宦情不共诗情长，笔债多于酒债多。

满目凄清端底甚，本生阅历此中过。

相反，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衍公却是惜墨如金。驻防临沂的五旅旅长李森，多次向衍公索要墨宝，被断然拒绝。“道不同不相为谋”。衍公始终恪守了做

人的信条。

衍公在家乡悉心培养了一大帮有成就的文人，其中的佼佼者郭仲选和陈允升，继承和发展了衍公的书法艺术，成为一代大师；兰陵众多的青年才俊，受衍公的影响，在幼小的心灵里，便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其中王思玷的小说，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王鼎钧曾在衍公的书房里，读唐诗宋词，读《老子》《文字》，沐浴进士第的遗风余泽，为他后来成为一代散文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衍公取得艺术成就，不仅在于他治学之严谨，更在于他三余读书之精神。以至晚年，衍公仍笔耕不辍，有诗为证：

呼灯课子雨凄凄，校律分编夜听鸡。
薄书尽碎怀诸葛，乐读随时美一瓢。

四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衍公与1500年前的陶渊明，似乎有心灵的共鸣。他们骨子里有着一样的清高与孤愤，亦有着一样的清廉与悲悯，在他们精神的世外桃源里，“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想来，衍公是快乐的。然而，谁又知道他内心的痛苦。

1938年3月26日，正是插柳口村的杨柳万条垂下的季节，日军的一颗炮弹突然落在了进士第的屋顶上，“拙笑轩”顷刻之间被炸得砖崩瓦飞。衍公惊魂未定，从书房里跑出来，进士第已是一片狼藉，当衍公在断砖破瓦里，隐约看见了“拙笑”二字时，他仰天大哭起来。

衍公想起38年前，散落在京城的那一匾额。当年，他用尽了心思，一笔一划将匾额恢复如初，他用匠心独妙之手，弥补了民族的自尊。没想到，如今自家墙上的匾额，也被外寇炸得四分五裂，衍公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

当衍公抬眼看见日本兵在他的“木石居”里喂马的时候，他终于停住哭声，随手拿了一根绳子，吊在了摇摇欲坠的“拙笑轩”的大梁上……

一代铁笔就这样走了，他走得很无奈，很寂寞。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一）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1949年春在《河北日报》任美编

1961年6月，临沂城老百姓纷纷传说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从北京下放来两位文化名人，一位是作家王火，一位是画家皮之先。

皮之先先生1928年7月生，河北阜城人。自从上世纪生活困难时期来临沂支援老区，直到2015年11月去世，共50多年。他在教育战线培育桃李，现在已是桃李满天下，有的学生已成为知名画家；他在画坛挥洒笔墨，辛勤耕耘，中西画兼擅，尤其是国画山水和人物均取得丰硕成果，受到国内外赞誉；他先后担任临沂文化局、美协、画院、书协的领导，对促进临沂艺术事业的发展和文化城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生前为中国美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教授、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七届山东省人大代表，临沂市政协常委。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奖状，并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山东省电视台曾拍专题片介绍其人、其艺。其传略被收入《中国当代画家大辞典》、《世界华人艺术家博览大典》等多种辞书。

艺术启蒙

皮之先出生在河北阜城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毕业于军官学校，因厌于官场，回乡举办教育，出任小学校长。父亲皮彝凡曾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青年时期即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1935年加入共产党。在县政府当过科长和议员，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建国后返乡教学兼种田，当过村长。母亲祁风云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外祖父是清末秀才，擅长书法。两个上师范的叔叔皆能书善画，每次回家都带回一些书籍，如《芥子园画谱》及各种画片，给儿童时期的之先以艺术的启蒙。

当时河北农村有许多寺庙，庙里有些彩塑神像和大量壁画，画的是神话故事及山水、花鸟等，形象生动，色彩艳丽，深深吸引了之先，他手摹心追，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艺术的幼芽。他五岁开始随外祖父上私塾，临摹颜、柳诸体字帖，为以后的书法打下了基础。

少年时期，之先就显露出绘画才能。十一岁加入阜城抗日县政府组织的儿童团，画了许多宣传打日本鬼子的大壁画，受到成年人的称赞。

1947年，19岁的之先考入冀南艺术学校。学校设在河北威县，距他家300华里。当时不通车，他需要走二三天的路程，为了追求艺术梦想，也不觉得苦。艺校的学生要学习音乐、美术、戏剧等科目。二年的学习生涯，磨练了之先的意志，领悟了艺术与人生的真正意义。

1948年，冀南画报社成立，之先被分配到画报社当编辑。当时的社长田辛甫（河北大名人，擅国画，后任河北省美协主席），副社长古一舟（山西运城人，擅国画，后在北京画院任职）。他们在艺术上都颇有造诣，又很关心爱护青年人，之先从他们身上学习了许多东西。

解放战争时期，之先和他所在的画报社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他画了许多配合解放战争的连环画，主要是反映支援前线和搞生产的，有时也画政治漫画。解放南京前夕，之先画了一幅《瓮中捉鳖》的漫画，比喻南京是瓮，蒋介石是走投无路的瓮中之鳖，即将被持枪的解放军捉住。作品构思巧妙，讽刺性、战斗性很强。

1949年，之先来到刚刚解放的保定城。这里是当时河北省政府驻地。他参加了河北文联的筹备工作，不久又被调到河北日报社当美编。社长翟向东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问家（后来担任过《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平易近人，对之先非常关心支持，他的人品和知识对启迪和引导之先向上起了很大作用。

名师传授

1949年7月，为了进一步深造，之先投考北平艺术专科学校，9月份正式入学。该校设有音乐、美术二系。不久，音乐系改为中央音乐学院，迁天津；美术系改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是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

之先所在的班级是由解放区华北大学美术系并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又招收了部分在职美术干部及美院教师的子女。班主任由胡一川（福建人，擅版画、油画，后调广州美术学院）、罗工柳（广东人，擅版画、油画）担任，教授有蒋兆和（四川人，国画系教授，擅画人物），李桦（广东人，擅版画）、滑田友（江苏人，擅雕塑）、左辉等先生。徐悲鸿院长对这个班特别关心，经常亲临教室指导，



连环画《小二黑结婚》(1950年)

给学生作业评分。一次之先画了一幅素描头像，整体比例不严谨，但徐悲鸿却找出作品的优点，并给予鼓励说：“这嘴的部分画得非常好，结构特别严谨，肌肉富于弹性。”这对之先是极大的鼓舞，使他对学画充满了信心。徐悲鸿对事业的忠诚，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对学生的爱，平易近人的作风，都给之先留下深刻印象，使他终生难忘。

建国初期，中央美院的教学基本搬用苏联美术教育的模式，注重素描、油画。强调美术作品要反映现实，反映生活。中国画当时叫彩墨画，因为花鸟画、山水画不便直接反映生活，受到冷落。学院里花鸟、山水课程很少。之先便利用课外时间去观赏、学习国画。他常和李苦禅一起去火神庙街一家画店，去观赏齐白石老人的画。因为李苦禅和老板是师兄弟，都是齐白石的弟子，便把齐白石的佳作取出来让他欣赏，如《群虾图》《三蟹图》等。虽然之先当时并不富裕，还是把《三蟹图》买了下来。这幅画挂在他家里十几年。齐白石精湛的大写意的艺术手法，高尚的思想情操，时时激励着他。

1949年，当时任中央文化部艺术处长的蔡若虹（江西人，擅漫画，后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看到，连环画具有很强的社会宣传作用，但形式陈旧，缺乏生活气息，而且内容有封建性糟粕，迫切需要改造成适应新时代的为群众服务的艺术形式。蔡若虹亲自组织旧连环画的改造工作，自己写脚本，亲自到皮之先那个班找几名优秀的同学，组成一个新连环画创作小组。蔡若虹交待故事情节，设计人物形象，之先和苗地、吴为、李焕民等同学分头起稿，最后统一画面。蔡若虹对每一幅都认真指导、审查，严格把关。他们同心合力共创作了《铜墙铁壁》《侯哥弹》《小二黑结婚》等六本新连环画，因内容健康向上，形象生动，很受读者喜爱，在新华书店一出现，很快被抢购一空，多次再版印刷，在全国影响很大，对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起了推陈出新的作用。

在中央美院主要是学习油画、水彩，但之先对中国画情有独钟，喜欢和国画

界前辈交往学习。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是他的校外课堂，每逢节假日和周末，他总是带着干粮在绘画馆一待就是一天，观赏名作到了痴迷的程度，对每一幅画都默记于心。这对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吸取了丰富的营养。

1951年，之先于中央美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教育部工农业余教育司工作，与全国总工会合办《学文化》杂志。在这里因为约稿他结识了著名画家王雪涛（河北人，擅写意花鸟，后任北京画院院长）、黄均（北京人，擅工笔花鸟，中央美院教授）诸先生。并与王、黄二位结成亦师亦友关系。因当时花鸟画受冷落，雪涛经济困窘，之先是仁厚之人，便约他为刊物画画，稿酬从优，使雪涛增加了收入。在雪涛家，听其谈艺，观其挥毫，也使之先受益匪浅。通过常接触，之先学会了雪涛的黑叶红花牡丹的画法。王、黄二位在艺术技巧上给之先很多指教，对之先作品提出真诚的意见，这对之先的创作促进很大。

1953年，之先和李滨声（辽宁人，擅漫画，曾任《北京日报》美编）二位被劳动人民文化宫聘为北京市职工业余艺校教师，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业余美术人才。

1954年，之先调到工人出版社，担任《中国工人》杂志社美编。该刊为当时全国三大刊物之一，每期都要有彩色绘画大插页。有一次为了配合国庆，准备在刊物上发表齐白石一幅牡丹，之先亲自去约稿，白石老人欣然命笔，画了一幅。之先崇拜白石老人，在美院上学时，有一次徐悲鸿特意请白石为学生作画示范，之先亲眼目睹了老人的神笔墨韵，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白石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理论，给他启迪很大，他创作常遵循这一原则。

皮之先对江南的山水向往已久。1957年春，他带着绘画工具和照相机，从北京坐火车到武汉，目睹了长江大桥建设的宏伟场面，画了一幅油画。他又从武汉溯流而上至三峡、重庆、成都，沿途观赏祖国大好河山，他心情激动，根据沿途的素材创作了国画《红岩》《嘉陵江畔》，发表于《中国工人》。另一幅《杜甫草堂》参加了全国美展。

在工人出版社工作期间，之先认识了该出版社印刷厂的医生孙允正。允正出生于老北京一个满族家庭（镶黄旗），其姑母是著名作家老舍夫人的弟媳，两家过从甚密。其父孙惠佑先生是多才多艺的老中医，教过私塾，在旧政府部门干过教育。解放后参与筹备北京市各学校的建设工作，受到政府的奖励，当过几个学校的校长。允正受其父亲的影响，擅长针灸推拿，并且经常参加出版社组织的歌舞戏剧演出。周末多次去人民大会堂参加领导人聚集的舞会。之先与她有业务上联系，两人经人牵线由相识到相知、相爱，随之结成美好姻缘。

（根据皮之先生前提供材料写，感谢皮燕斌、皮崴补充材料。）



重庆码头（油画写生 1957年）

前河湾村新四军军部

本 编



临沂市河东区九曲街道前河湾村，是新四军历史上最后一个军部，同时也是华东野战军诞生地，因此该军部地位特殊、意义非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据史料记载，“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南部队撤到江北，军部率部分主力挺进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1945年10月上旬，新四军军部迁到临沂，当时驻在临沂城西门里路北原德国天主教堂后院。1946年1月7日，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1946年初，前河湾村就设有新四军服装加工厂。6月，军部移到前河湾村，设在地主丁西月家的两个四合大院里。陈毅、张云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了著名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临沂阻击战，制定了莱芜战役的作战计划。

鲁南战役后，1947年1月23日，为了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华东解放区调整党政领导机构，军队统一整编。新四军、山东军区、华中军区番号撤销，组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建华东野战军。至此，新四军在在前河湾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1947年2月15日，我军隐蔽北上，主力撤离临沂。新四军军部从前河湾村北撤。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于2007年9月修复完成。我军撤出后原新四军军部遭敌机轰炸，房屋大部被毁。现在新四军军部旧址暨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诞生地，被公布为国家级、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画说于腾 (下)

高雷

三、作为收藏家的于腾

于腾荣膺收藏家的称号，不是一蹴而就，但也堪称神奇。他一没有家传，二不是专攻，顶多也就是上过速成班，短短几年的功夫，却跻身晚清收藏大家之林，不得不佩服他聪慧过人。而他的成功也值得我们借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于腾的成功，得益于良师益友。于腾的收藏圈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是方家里手，难于登堂入室，譬如李佐贤、李思庆。

李佐贤（1807—1876），字仲敏，号竹朋，山东利津县左家庄人。道光八年（1828年）乡试夺魁中解元，十五年（1835年）会试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八年殿试，3年后加科散馆，由礼部庶常授编修，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总纂。道光二十四年典试江西，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出任福建汀州知府。咸丰二年（1852年）引退故里。他不仅是清代颇有影响力的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是著名诗人。《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咸丰、同治间……收藏书画者，当时有‘三李’之目，谓李季云恩庆，李西园东，李竹朋佐贤也。”李佐贤还与戴熙、吕尧仙、刘燕庭、吴式芬、陈介祺、鲍康、叶名澧诸人交好。李佐贤在晚清收藏界的地位，可谓一呼百应。亲不亲故乡人，于腾结交李佐贤，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石涛（1641—约1707），俗姓朱，名若极，广西桂林人。明藩靖江王朱守谦后裔，朱亨嘉子。1645年后削发为僧，法名原济，一作元济。小字阿长，字石涛，号大涤子、小乘客、清湘遗人、瞎尊者、零丁老人、苦瓜和尚等。擅花卉、蔬果、兰竹，兼工人物，尤善山水。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高僧”。刘海粟曾这样评价石涛：“在中国艺术史里，从王维到现在，这一千一百六十八年间，不少高品的艺术，但是怎能比得上八大与石涛的伟大，永远在艺苑里，放射不朽的光辉”。现存石涛《枕流拥书图》纸本设色，宽59厘米，长93厘米，光绪乙巳（1905）年重裱。钤印：石涛、瞎尊者。鉴藏印：竹朋鉴定、飞卿过眼、藏之大千、大风堂珍藏印。此图奇松突兀，气势浑茫，横亘山石，形态各异，远方湖水，岚气弥漫，静谧而空灵。山石以淡墨勾皴，用浓墨、焦墨破擦，多种皴法交织互施，满纸氤氲呼呼欲出，极尽山川变幻之形势。笔墨虽简约，但意境深邃、悠远，大有“踏遍名山人未老，奇峰搜尽半



石涛《枕流拥书图》

尺宣”的心界。其中的竹朋鉴定、飞卿（即于腾）过眼钤印，向我们昭示了两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再譬如李恩庆，李恩庆（？~1864），隶汉军正白旗，字季云，一曰寄云，室名爱吾庐，河北遵化人。道光十三年进士，由御史官两淮盐运使，精鉴别，富收藏。兴到偶作山水，辑有《爱吾庐书画记》。同李佐贤、戴熙关系匪浅。

李恩庆有一卷崔恣《竹林飞禽图》，后转到了于腾名下。该图钤有乾隆嘉庆内务府印章10方：明项子京“项子京家珍藏”（朱文）。明代开国功臣沐英第三子沐昂“黔宁王子子孙永保之”（白文）。康熙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芳林主人鉴赏”（白文）。汪由敦两方印章“汪由敦印”（白文）、“谨堂”（朱文）。梁诗正两方印章“诗正”（朱文）、“香林”（白文）。吴大澄“恪斋鉴藏书画”（白文）。伍元蕙“南海伍元蕙宝玩”（朱文）。载铨“曾存定府行有恒堂”（朱文）。于腾（字飞卿）“飞卿过眼”（朱文）。李恩庆“李氏爱吾庐珍藏书画记”（朱文）。

画幅后有近代画家陈石濂的题跋，断定此作为崔恣传世孤品。画面上青翠的竹林中，各种飞禽或左右顾盼，或引颈相啼，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如临其境，令人叹为观止。

崔恣，北宋院体画家（即宫廷画家），生卒年不详，北宋著名花鸟画家崔白之弟，濠梁（今安徽凤阳）人，官至左班殿直，工书花竹翎毛，笔法规模，与白相若，凡造景写物，必放手铺张而为图，所画花鸟善于表现荒郊野外秋冬季节中花鸟的情态神志。崔恣和崔白两兄弟的花鸟画打破了自宋初100年来由黄荃父子工致富丽的黄家富贵为标准的花鸟体系，开北宋宫廷绘画之新风。

于腾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藏友，时常伴随左右，这就是沈贤修。沈贤修（1835—1914），刘师培《左庵外集》记载：“沈鹤子寓蜀有年，以书画名，尤精鉴古。号鹤子，一号禅和子。”祖籍浙江吴兴，清同光时宦游四川，曾任县丞、蓬溪盐大使等小吏，嗜佛，善画佛像，篆、隶尤工，取法于邓石如。蜀中遗迹颇富。他的交游甚广，在政界交往者有张之洞、吴棠、吴郁生等，并与书画家、收藏家于腾、沈渊公、方濬颐、冯金伯、严岳莲、如山、端秀、胡世荣、钱鸿、俞昌言、叶大起、唐少坡、宣维礼、邹宪章等人过从甚密。光绪二十五年，因“行止不端”被革职。沈贤修不仅眼力过人，精通篆刻，而且对历朝历代书画家印信，收藏家鉴赏章如数家珍。有《沈贤修



崔恂《竹林飞禽图》

印谱》传世，内有为于腾制作的“飞卿过眼”“飞卿珍秘”等印章印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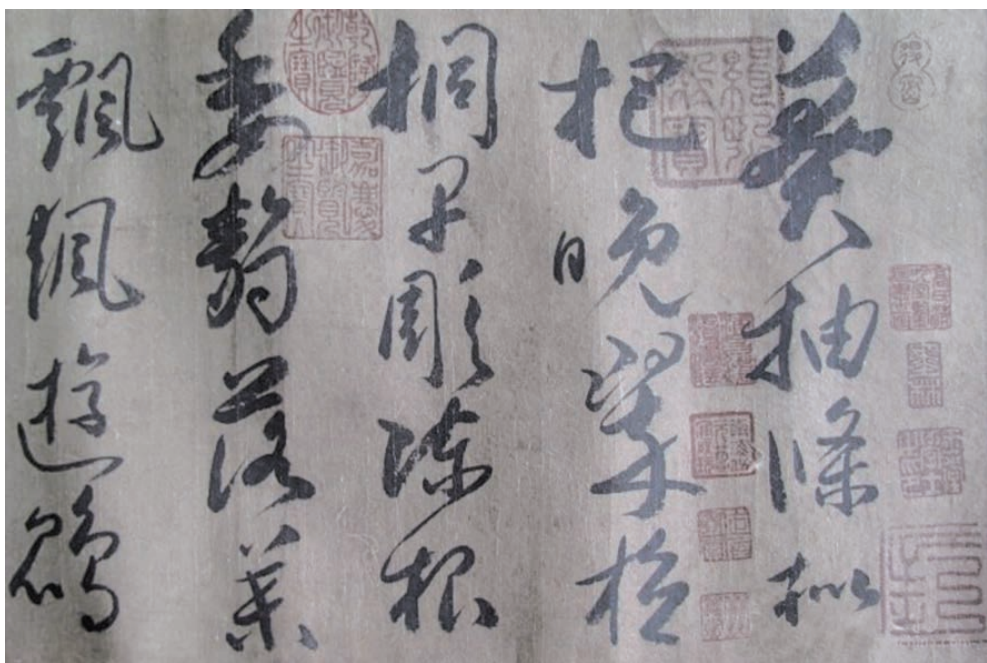
从于腾的藏品中可以发现，不是名家的书画他从不过问，不是流传有序的作品他不去购买。于腾尤其佩服当时那些超凡入圣的收藏大家如吴荣光、徐渭仁之流的鉴定，对这些人家中流出的藏品，不遗余力，尽可能纳入囊中。

吴荣光（1773—1843），原名燎光，字伯荣，又字殿垣，一号荷屋、可庵，别署为拜经老人，晚年又别号石云山人。清广东南海人。嘉庆己未进士，历任编修、擢御史及巡抚天津漕务（河运）。道光年间官到湖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后因事被降职为福建布政使。工书画，精金石，对碑帖考鉴造诣极深，他集编家藏真迹及拓本刻成《筠清馆法帖》六卷，有著作《帖镜》《辛丑销夏记》《石云山人诗稿》等。

徐渭仁（1788—1855），字文台，号紫珊、子山、不寐居士。上海人。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书画鉴赏家，精于鉴别，当时人称为“巨眼”。室名有“隋轩”“春晖堂”“千声室”“宝晋砚斋”“实事求是斋”“寒木春华馆”等。他藏书画、图书的印章有“文台”“紫珊秘玩”“上海徐渭仁收藏印”“上海徐紫珊收藏书画金石书籍印”。辑有《春晖堂丛书》《隋轩金石文字》《法帖》。

或者是缘分，或者是巧合，于腾自称“东海郊人”，曾购得大量吴荣光藏品。其中两幅精品，在世之时就转入了“兰陵缪氏”之手。“兰陵缪氏”何许人也？缪荃孙也。缪荃孙（1844—1919年），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郡望山东兰陵，江苏江阴申港镇缪家村人。后举家迁居成都，时年已21岁。1867年应四川乡试中举，因非川籍人，未授名。后充总督吴棠、川东道姚彥士幕僚，遍历川东北各地，搜拓石刻。张之洞任四川省学正，曾执贄门下，为其撰写《书目答问》4卷。清光绪丙子（1876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事编撰校勘十余年。这两幅作品分别为：唐高闲《千字文》残卷与北宋张先《自书诗卷》。

高闲，乌程（今浙江湖州）人，生卒年不详。是一个活跃在唐宣宗（847—859年）时的书家，曾出家于湖州开元寺，后入长安荐福寺、四明寺，事佛余暇，酷爱书法，尤善草书，学张旭、怀素草书之法，并与当时的名诗人张祜、陈陶以及著名文学家韩愈友善，相互过从甚密，张祜曾作《赠高闲上人》诗云：“道心黄叶老，诗思碧云秋；卷轴朝廷笺，书函内库收”。这说明高闲法书在当时已被朝廷所重视。高闲



高闲《千字文》（湖州本）

《千字文》残卷为纸本，纵26厘米，横252厘米，白麻纸质。前后两边均残。书心上钤有宋、元、明、清各时期官私收藏玺印。吴荣光为“荷屋鉴赏”，于腾为“飞卿过眼”，清缪荃孙是“缪荃孙藏”。残卷因在浙江湖州发现，被称之为“湖州本高闲《千字文》”。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人。北宋时期著名词人，天圣八年进士，官至尚书都官郎中，晚年退居湖杭之间，与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蔡襄等时有酬唱，相交甚欢。他善作慢词，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著有《张子野词》。

张先《自书诗卷》，水墨纸本，尺寸：45×346厘米。引首：自书诗卷，文嘉书；钤印：文氏休承、文嘉；款识：调寄一从花，吴兴张先，拖尾：挥毫落笔，出规入矩 笔笔流丽，潇洒大方，张照题（雍正乾隆年问题）。钤印：张照私印，收藏印有：飞卿过眼（于腾）、缪荃孙藏、荷屋鉴赏（吴荣光）等。

于腾收藏了如此多的国宝，需要大量资金调用，他是如何筹措得呢？看看吴永是怎么记叙的。吴永（1865—1936），字渔川，一字盘公，盘庵，室名观复斋，别号观复道人。祖籍吴兴南门前邱，生于四川宁远府西昌县。8岁能文。清光绪四年（1878）父歿，次年随母徙成都。光绪十四年（1888）娶曾纪泽次女。光绪二十三年，经过李鸿章的大力推荐，补授直隶怀来县知县。八国联军时，因迎驾有功被慈禧重用。元配早逝，再娶盛宣怀之堂妹为继室。民国初年曾任山东提法使。工书法，学董其昌。他口述有《庚子西狩丛谈》一书。

吴永1928年写道：“于腾字飞卿，山东兰山人，光绪初官四川知县，余幼在蜀中知其人为能吏，家甚富，所收法书名画多精品。后劾罢归里，极图书园林之乐。多内宠，殉后诸姬争产构讼，家遂中落，所藏散若云烟矣。噫！以项子京之风雅隽迈，收藏之富甲海内，身歿未几，遭兵燹掠夺殆尽，得毋收藏家，例为造物之所忌乎。”“能吏”也，在此权当一家之言。

当然，于腾还有另外一面，《益州书画录续编》记载：善诗，工书，尤善笔札。赏鉴尤精，刻宋本《昭明文选》《皮子文藪》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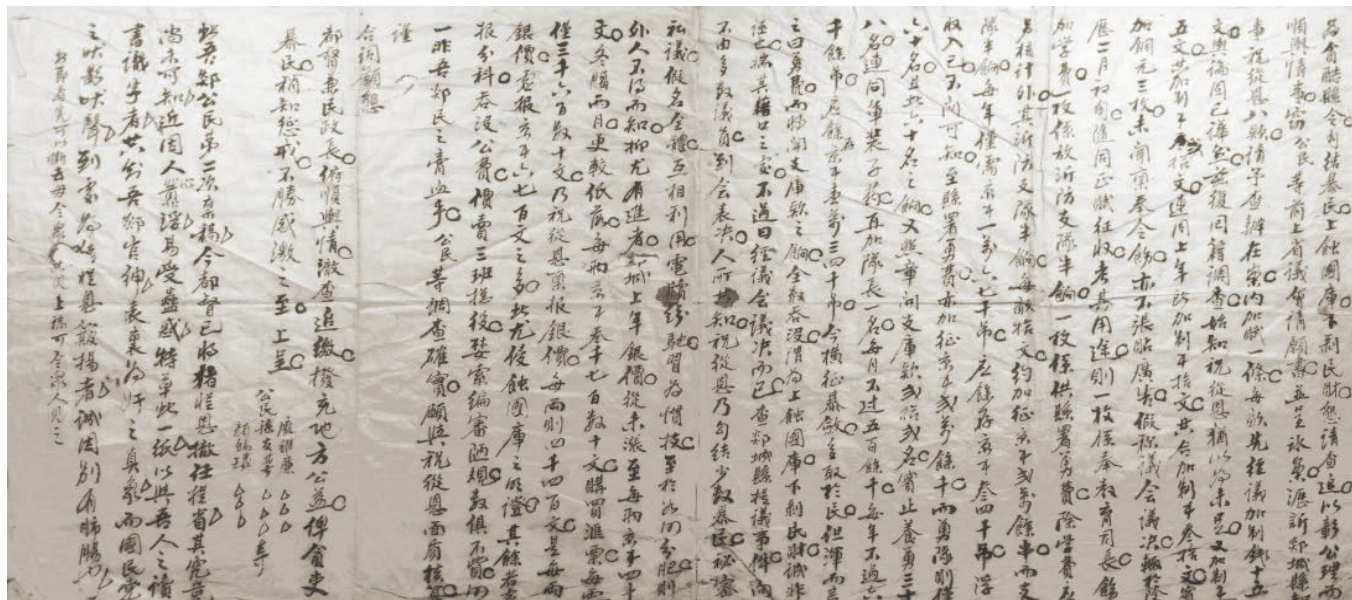
一则民国十年郯城县士绅的 反腐告白

高雷 王洪永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杀得天昏地暗，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满清封建王朝的垮台也粉碎了封建枷锁的束缚，民众意识到了自我的价值，民主思想蔚然成风。下面这篇民国十年（1921年）郯城部分士绅的反腐告白，扯出了当地的一桩公案，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态。

1921年1月，山东省郯城县迎来了民国以来的第九任县知事，知事也就是县长，名字叫祝从恩，安徽人，来此之前，此人曾任过安徽县知事、代理芜湖。知事知事，顺乎民情，造福一方也就罢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据说在郯城县非十恶不赦，但罪行也有八款之多。请看以下告白：

为贪酷县令勾结暴民，上蚀国库，下剥民财，恳请查追，以彰公理，而顺舆情事，窃公民等前上省议会请愿书，并呈冰案，历诉郯城县知事祝从恩八款，请予查办在案，内加赋一条，每亩先经议加制钱十五文，舆论固已哗然，兹复回籍调查，始知祝从恩犹以为未足，又加制钱五文，共加制钱贰拾文，连同上年所加制钱拾文，共合加制钱叁拾文，实加铜元三枚，未闻禀奉令饬，亦不张贴广告，假称议会议决，辄于阴历二月初旬，随同正赋征收，考其用途，则一枚系奉教育司长饬加学费，一枚系放沂防支队半饷，一枚系供县署勇费，除学费应另核计外，其沂防支队半饷，每亩拾文，约加征京钱贰万余串，而支队半饷，每年仅需京钱一万六七千吊，应余存京钱三四千吊，浮收入已不问可知，至县署勇费，亦加征京钱贰万余吊，而勇队则仅六十名，且此六十名之饷，又照章开支库款二十二名。实止养勇三十八名，连同军装子药，再加队长一名，每月不过五百余吊。每年不过六千余吊，应余存京钱一万三四千吊。今横征暴敛，多取于民，但浑而言之曰勇费，而将开支库款之饷，全数吞没，谓为上蚀国库，下剥民财，诚诈诬也，揣其藉口之处，不过曰经议会议决而已。查郯城县提议事件，向不由多数议员到会表决，人所共知。祝从恩乃勾结少数暴民，秘密私议假名全体，互相利用，电牍纷驰，习为惯技，至于如此分肥，则外人不得而知。抑尤有进者，郯城上年银价从未涨至每两京钱四千文，冬腊两月，更较低落，每两京钱三千七百数十文，购买汇票每两仅三千六百数十文，乃祝从恩禀报银价，每两则四千四百文，是每两银价，虚报京钱六七百文之多，此尤侵蚀国库之明证。其余若虚报分科，吞没公费，价卖三班总役，婪索编审陋规，数俱不赀，此



一非吾郑民之膏血乎，公民等调查确实，愿与祝从恩面质核算。

谨

合词论肯。

都督兼民政长俯顺舆情，彻查追缴，发充地方公益，俾贫吏暴民稍知惩戒，不胜感激之至。

上呈

公民 庞维廉 孙友萼 颜锡璘 等

此吾郑公民第二次禀稿，今都督已收，猪从恩撤任提省，其究竟尚未可知，近因人心嚣浮，易受蛊惑，特草此一纸，以与吾人之读书识字者，共知吾郑官绅表里为奸之真相。而国民党之吠影吠声，到处为猪从恩簸扬者，诚因别有肺肠也，此节看完可以撕去，毋令众人共见，上稿可令众人见之。

以上是郟城士绅庞维廉、孙友萼、颜锡璘写给其学生的告白。孙友萼（1854—1924），字华楼。清末民初山东郟城县马头镇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酉科举人，援例为内阁中书兼国史馆方略馆职。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进士，历任江苏桃源、邳州、安东、阳湖、元和、金坛、江阴、丹阳、无锡等地地方官，颇有政声。任桃源县知县时，正值荒歉，他筹措赈抚捐资，疏浚程子河、洪泽湖，以工代赈，使该县历年昏垫之区变成膏腴之地，宿迁、泗州等县水灾亦大为减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解职回籍。1914年秋，郟城遇大水灾，沂、沭河决口30处，孙友萼力请义赈，督办先后拨7000元修堵决口，又倡捐平糶，周济饥民，请除附捐，以减轻乡民负担，其为民请命，耿介直言，深得地方人士赞誉。后避居济南，年七十而卒。庞维廉、颜锡璘身份不详。

1921年郟城县天灾人祸交加。夏，重坊沂河决口，大片农田受淹绝产。8月，县境土匪猖獗，抢架毙命之案不胜枚举。再加上如此官蠹，百姓走投无路，士绅抗争势在必行。而民国初年的官场面子还是要的，所以祝从恩被撤任提省，后不知下落。此文也就成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见证。

琅琊古仙传

孙启鸿

琅琊为神仙福地，境内蒙山是道教名山，道经《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将其列为仙家靖庐、修仙福地，无数仙真高士在此修炼得道，开宗立派，度化世人，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神龙难见羨门子

羨门子，名高，传为上古仙人，其真实姓名及事迹掩映在传说的迷雾中，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难以稽考。连一向以稽古钩玄著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也只是寥寥几笔带过，语焉不详。按照司马迁审慎的笔法，秦始皇一统六国后，曾多次遣方士入海寻仙人羨门子高及安期生，无果而终。但据蒙山民间传说、白云岩道观碑记及县志所载，羨门子高隐于蒙山，传授至道要诀。



蒙山白云岩道观

蒙山白云岩为道教全真派华山宗重要道场。道光四年《修白云岩记》云：“云蒙福地也。古传三十六壑，七十二峰，灵宝洞府，往往而有。……因累古今得道此地者，轩辕帝时有蒙山老人，后有羨门子、列国琴高、汉栾巴、董京威，晋贺元、宋皇甫希永、张紫阳、元徐双宜、乔全、明杨真人、张九经公于白云岩飞升仙路。”蒙山老人杳不可考，其余诸位见于正史、方志、道典，教内口耳相传，足可备为一说。

神仙风雅数琴高

琴高，东周列国时仙人，《列仙传》称其为赵人，据道光四年《修白云岩记》所载，曾隐居蒙山修道，雅善琴瑟，今白云岩有琴台遗迹。

琴高，顾名思义是一位琴师。传说他曾潜入河中擒拿龙子，临行与弟子们约期相见，嘱咐大家在河边为他立祠，等候师父复出。弟子们将信将疑，只好按照师父吩咐，动工完毕，准时在河边恭候大驾。等待良久，不见水面有任何动静。就在弟子们懈怠不已、人心涣散之际，忽然从水面上蹿出一片漩涡，巨浪冲天，只见琴高乘着巨大的红色鲤鱼，一跃而出，将龙胆猛地抛到岸上，弟子们一片欢呼。琴高和弟子们感情日深，相处一月有余，不得不洒泪分别，再次乘坐鲤鱼仙去。琴高也为蒙山道教留下了雅善音律的传统。山上有一处悬崖峭壁，名为白云岩，是历代道士修炼得道之所，高山流水间，唯有山风相和，鸟鸣林幽，音乐如酒，须善饮者方得此中三昧。听一曲清商雅乐，洗尽凡尘俗念，如此方能长寿，享受难得的清福。

老莱子高隐蒙麓

老莱子是春秋时隐士，楚人，道家著名人物，生卒年不详，民间传说“二十四孝”中“戏彩娱亲”的主角。老莱子生平事迹散见于《庄子》《史记》《高士传》等古代典籍，传有《老莱子》一书，今已不存。传说曾隐居蒙山下，与孔子就何为君子之道发生过睿智而有趣的对话，后高寿而卒。

老莱子身世成谜，因而曾被后人视为道家鼻祖老子的别名，《史记·老子列传》即在老子传记后附了一段老莱子的简介：“或曰：老莱子者，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修道而养寿也。”但毕竟出于史学家的严谨，司马迁只是存疑，未敢轻下论断。

西晋学者皇甫谧在其《高士传》勾勒了一段较为清晰的老莱子隐居生活断面。书中提到因楚国上层内乱，老莱子避乱逃到楚国北疆蒙山之阳，在荆棘草丛间建造屋宇，用木棍树枝架起床铺，饮水食菽，垦山播种，生活清苦，却怡然自乐。有人向楚王进言，不应该让贤者四处流散成为朝廷隐患，楚王于是亲临蒙阳，邀请老莱子出仕，见到老莱子正在手工编织簸箕，大不以为然。君臣相谈良久，老莱子犹疑半晌，最后答应出山。老莱子妻子打柴归来，暗暗观察，等楚王大队人马走后，忙上前问道：“你答应了么？”老莱子点头。妻子叹息道：“难道没听过，能赏你酒肉的，也会随时赏你鞭子；能赏你俸禄的，也会随时赏你刀斧。咱们怎么能寄人篱下任人宰割呢？”说完便扔下簸箕，老莱子也跟随妻子四处迁徙，不知所终。

道家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庄子是战国时人，距老莱子生活时代较近。《庄子》中记载了老莱子隐居蒙山后，与孔子进行学术交谈的场景。老莱子弟子出外打柴，遇上孔子，归来便向老莱子报告：“老师，我在山下见到一人，上身高而下身短，伸颈曲背，两耳后贴，眼观六路，鼻孔高傲，好像天下都在胸中，却不知道是谁。”老

莱子说：“此人必是孔丘。快去请来。”孔子来了，老莱子劈头盖脸说道：“丘，去掉矜持的仪容和自视聪明的神态，就可以成为君子了。”孔子听罢，作揖而退，谦恭地问道：“夫子，我所追求的仁义之学还可以修进并为世人所用吗？”老莱子说：“哎！不忍一时的损伤却会留下万世奔波不息的祸患，你是本来就孤陋蔽塞，还是才智赶不上呢？布施恩惠以博取欢心并因此自命不凡，这是终身的丑恶，是庸人的行为罢了，这样的人总是用名声来相互招引，用私利来相互勾结。与其称赞尧舜而非议夏桀，不如两种情况都能遗忘，而且堵住一切称誉之门。背逆事理与物性定会受到损伤，心性被搅乱就会邪念顿起。圣人顺应事理稳妥行事，因而总是事成功就。你执意推行仁义且以此自矜又会怎样呢？”

相传秦末孔子后人孔鲋编有《孔丛子》一书，记载孔门师徒言行。其中提到孔子嫡孙“述圣”子思与老莱子的对话。当时鲁穆公将拜子思为相，老莱子便问道：“阁下将如何事奉君主呢？”子思答道：“顺我的性情，以道相辅，不惧死。”老莱子曰：“不可顺着你的性情啊！你性情刚直又藐视不肖之徒，还怕死，不适合为人臣子。”子思曰：“不肖之徒才薄德轻，才被人轻视。事奉君主，大道畅行言听计从，怎么还会忧惧死亡？道不行言不听，何来事君，更无所谓生死之祸。”老莱子叹息道：“你没见过牙齿么？虽然刚硬，却易磨损，舌头柔顺，却得以保全。”子思大笑道：“我不能像舌头那般柔顺，因此不能事君。”

上述对话可以看作先秦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的思想碰撞，同时也可以看作两种人生追求和生命意义的不同呈现。儒家典籍《大戴礼记》曾记载，孔子对老莱子极为佩服，赞叹道：“道德恭顺，为人诚信，终日言语没有闪失，邦国无道，守志无怨，安贫乐道，唯有老莱子才能做到啊！”

至于民间传说中老莱子“戏彩娱亲”，最早见于《艺文类聚》引《列女传》，而《列女传》中只有老莱子妻劝夫拒绝楚王邀聘、洁身归隐之事，与《高士传》记载相同，并无戏彩娱亲情节。因而可以断定系民间传说，久而进入史籍。该故事情节极为简单：老莱子至孝，尽拣美味供奉双亲，七十岁尚不言老，常身穿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老莱子因“戏彩娱亲”后成为二十四孝之一。

千古智圣鬼谷子

鬼谷子是东周时道家人物，传说他善晓天机，通彻阴阳，周知万物，被誉为智慧老祖，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活神仙，其徒弟张仪、苏秦、孙臆、庞涓等将其思想发扬光大，在战国纷乱之世，金戈铁马，纵横捭阖，将历史演绎得纷繁多彩。鬼谷子无偏无党，无门无派，虚怀若谷，集诸子之学，纳众人之智，是当之无愧的智圣。

鬼谷子智慧广大，通晓五行八作各种手工技艺，有鬼斧神工之誉；汲取诸子百家思想精华，弃其迂腐糟粕。他知存亡，明利害，通权达变，善于经营战略。弟子庞涓略知一二，即任魏国大将，连战连捷，纵横无敌，降服韩赵诸国；弟子孙臆得其真传，出任齐国军师，以围魏救赵之策，破魏称霸，各国畏服，并有《孙臆兵法》传世，堪称兵学至尊。苏秦学业过半，即以平民之身游说六国，佩六国相印而行合纵之策，迫使狂秦废除帝号，十多年不敢妄动。张仪得其余绪，出任强秦相国，以连横之策各个击破，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俗话说，名师出高徒，鬼谷子因此被人们奉为纵横家鼻祖，兵法家大师，谋略家泰斗，术数家尊长，道家神仙人物，开百工匠作先河。这种全才、通才和天才人物，古今少有，中外罕见，确

属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之一。

鬼谷子的政治思想颇为超前。《鬼谷子》书中写道：“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以治，则抵而得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意思是说不要盲目崇古守旧，更不要为统治者尽愚忠，一切以世道治乱、人心顺逆为评判标准。这就触犯了统治者的逆鳞，遭到历代王朝和正统文人的贬抑查禁。幸亏《道藏》中留有余荫，否则今天的人们就读不到这一两千年前的智慧成果了。

鬼谷子和他的著作长期湮没，但历史的尘埃掩不住它的奇异光彩。无数历史实践证明它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现代人若能了解鬼谷子其人其事其思想、智慧、造诣，必能会心一笑。同时，还可学会对话谈判技巧，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学会经商致富方法，从而更好地保护和发展自身利益，使今后生活过得更富足、满意和美好。

鬼谷子的众多徒弟都名垂青史，他本人却神龙见首不见尾，成了千古谜团。首先是鬼谷子的真姓大名。蒙山父老一直口耳相传，鬼谷子姓王名禅，也有说是王诩。平邑县文化馆副研究员、蒙山文化研究会会员王晓东先生曾经读《全唐诗》，发现陆龟蒙诗句中鬼谷子又称王詡（音禅）。因此他推测，蒙山父老相传的鬼谷子名王禅是正确的，只是因为詡字太冷僻，便用同音字代替。而王诩则明显是因为字形近似产生的讹误。

鬼谷先生的籍贯，大概有五种说法：河南登封、陕西三原、湖北远安、湖南大庸、山东平邑。其中山东平邑说相比之下理由非常充分：其一，《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鬼谷先生。”苏秦是洛阳人，齐国是东方大国，蒙山最早为齐鲁交界，合乎司马迁的记载。其它四说，陕西、湖北、湖南均方位不符，登封不在齐地，均与《史记》相悖，难以自圆其说。其二，诸说均认为鬼谷子为楚人。蒙山南麓颍舆国附属于鲁，后被楚国所灭，蒙山成为齐楚交界，恰与诸说暗合。其三，鬼谷子除与墨子为友居云蒙外，又与孔子高徒子夏往还为友。蒙山南麓平邑县卞桥镇有鬼谷子村和子夏讲学处等遗迹，可为证明。其四，蒙山历史悠久，为名山大川。蒙山相传为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之山，周成王封伏羲后裔建颍舆国，主祭蒙山，实祀太昊，即《论语》所谓“东蒙主”，《孟子》所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处。人文荟萃，吸引力强，又是齐鲁楚魏四大强国间隙地带，鬼谷子选择此地隐居授徒，实在是眼力。

鬼谷子对养育他的蒙山留下了深刻烙印。蒙山脚下的鬼谷子村文脉延绵，香火缭绕，当地老百姓至今还有鬼谷子和碧霞元君争夺蒙山的传说。相传当年碧霞元君途经此地，见蒙山到处山清水秀，灵气逼人，便降下祥云，登上龟蒙顶，准备在此修炼。这下可急坏了王禅老祖鬼谷子，他从“鬼谷洞”匆匆赶来，与之评理，说他早已在此修炼多年，请元君另投它处，然而碧霞元君又岂肯轻易相让，两人正在争吵不休。正巧我佛如来经过此地，一看两位大仙竟然为了一座山峰喋喋不休，不禁大怒，他对着山峰大掌一拍说：“你们两个已位列仙班，现在竟然为了一座山峰大吵大嚷，成何体统？”碧霞元君毕竟脸皮薄，听佛祖这么一说，不禁脸上飞红，悻悻然驾上祥云，飘然而去。碧霞元君后来在泰山安了户，被尊称为“泰山奶奶”。因为留恋蒙山的别致的美，所以也时常回蒙山串门，于是人们就给她建了一座泰山行宫。

海上仙人安期生

安期生，秦汉间著名方士，世人传为海上仙人，南朝著名道人陶弘景在其道教

神仙谱系《真灵位业图》中称之为北极真人。

关于他的传说，《史记》《列仙传》等均有记载。《列仙传》称其为琅琊阜乡人，卖药于东海边，不知年齿，时人尊为千岁翁。秦始皇东游，闻其名而邀请相见，交谈三天三夜，始皇称之为异人，赐给黄金玉璧，价值万钱。安期生将黄金玉璧放在阜乡馆驿内，任人取用，并留书一封，以一双赤玉鞋为报，相约数年后相见于蓬莱仙山。始皇于是派徐福、卢生等带几百人数次入海探寻，每次都遇大风浪被迫返回。始皇无奈，只好下令在阜乡立祠十余处以祭拜。

《史记》记载，西楚霸王项羽起兵反秦，安期生与好友蒯通前往献策，项羽起初不能用，后又想封官加爵以笼络二人，两人不肯受，浪迹四海，不知所终。汉武帝时，好神仙之术，贪求长生，重用方士李少君。李少君自称曾于东海之上亲眼见到安期生，安期生以仙枣招待，枣大如瓜。汉武帝大为触动，亲自祭祀安期生，还派遣方士入海寻找蓬莱仙山。李少君病死后，汉武帝又宠幸方士栾大，栾大自称在东海之上曾见安期生，武帝执迷不悟，又派遣栾大到东海向安期生求不死之药。虽然仙药未得，汉武帝恼羞成怒，诛杀方士，但也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难免最终的归宿。

秦皇汉武都是一代雄主，但对生命盛衰代谢的规律都未能参破，而是执迷于长生不老的梦呓中，屡屡被故弄玄虚的方士所骗，贻笑后人。作为生命长存的美好向往，神仙安期生是可遇不可求的，正如《汉书》所云：“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之，不合则隐。”道不同不相为谋，对汲汲于求神问仙的俗人而言，这是最好的答案。

东海异人有黄公

《乾隆沂州府志》转引《西京杂记》载：黄公，名不可考，东海郡（今郯城县）人。年轻时修炼法术，能制蛇御虎，腰间佩赤金刀，时常用红色缙帛裹头，招摇过市，引人驻足。传说他能兴云布雨，变幻山河，因而大受欢迎。可惜后来年老体衰，加之持戒不严，饮酒过度，再也不能正常发挥法力。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郡，黄公醉酒壮胆，手持赤刀前往镇服，结果反被老虎吞噬。这便是修道不诚、学艺不精的悲剧。

沧海桑田王方平

王方平，东汉时隐士，东海郡（今郯城县）人，辞官修道，飞升成仙，成语“沧海桑田”与其有关。

《神仙传》载：王方平原名王远，字方平。自幼熟读经史，通儒家五经，后举孝廉，被任为郎中，加官至中散大夫。王远擅长天文、图讖、河图洛书等学，通晓精要，对天下盛衰、九州吉凶有强烈的预感，因此弃官修道，学道有成，远近闻名。

东汉著名昏君汉桓帝闻其贤名，多次下令征召入朝，王远闭关不出。朝廷大怒，命郡守强行劫持出山，拽上车子，送至京师。桓帝召见时，王远低头闭口，沉默不语，惹得君王恼怒。后在宫门扇板上题写四百余字，预言未来之事。桓帝很不高兴，让人用刀将字迹削去。可墨迹早已入木三分，刮去一层，转瞬又浮现一层，桓帝无奈，知道王远乃神仙人物，只好放归山林。

王远没有子孙，乡里闻其仙名，世代供奉。同郡太尉陈耽，乐善好施，特意



修建道室，恭请王远入住，旦夕朝拜，祈福消灾。王远在陈家四十余年，阖府太平无事，上至太尉下至仆役，久未罹患重病，六畜兴旺，蚕利百倍，仕途畅达。忽有一日，王远召陈耽说道：“我在凡间气数已尽，明日午时便要启程。”次日正午，王远果然仙去，只留下遗蜕。陈耽不敢贸然收葬，痛哭道：“先生舍我而去，我将何如？”于是备棺焚香，将王远尸身和衣入棺。三昼夜后，管家忽然报告，王远尸身不见了。陈耽大惊，率家人仆役查看，但见衣冠犹然，衣带未解，唯尸身不翼而飞，犹如蛇蜕一般。王远死后百日，陈耽也去世了。有人说他得了王远道术，随其仙去。

传说王远后来去括苍山，经过吴地，借宿胥门百姓蔡经家。王远一看便知此人骨相非凡，虽为匹夫，犹可成仙，便单刀直入说道：“阁下骨相非凡，本应位列仙班，怎奈少时无知，未修仙道，而今道气太少，俗肉太多，不得升天，只得尸解尔。唯尸解时大为苦痛，如屈身钻狗洞，尔其忍之。”蔡经听罢，张口结舌，点头称是。王远于是传授至道秘要，告辞而去。

王远走后，蔡经忽觉燥热如火，全家赶忙搜罗盆盆罐罐，不停往他身上泼水，好比泼到滚烫的焦石上，一片热气腾腾。如此三昼夜，蔡经早已形销骨立，颤巍巍躺到床上，裹着厚被。后家人忽然发现蔡经不翼而飞，掀开被子，但见一张人皮，如蝉蜕一般。

十多年后，蔡经突然回家。邻里家人大为惊诧，遥想离家骨瘦苍髯，而今发黑体健。蔡经对家人说：“七月七日，王仙人将至。”那日，蔡家借了许多锅碗瓢盆，准备了百斛食物。不久，仙人王远从天而降，只见他头戴远游冠，身穿朱袍，衣绣虎头，挎五色缓带，腰佩宝剑，五龙驾车，车缀五彩鸟羽，仙官随侍，旗鼓轩昂。

王远端坐蔡家，随行仙官隐去身形。蔡经将亲属一一引见。王远派人去请麻姑，蔡经却不知麻姑是哪家仙人。不久，使者回报：“麻姑奉命巡视蓬莱，不久即到。”蔡经但闻声音，不见使者身形。约莫两个时辰，麻姑飘然而至，望之不过十八九，身姿绰约，发如瀑布，天衣华美，光彩照人，世间所无。宾主施礼相见。蔡经召唤摆宴，杯盘皆珠玉，食物皆卉果，香气四溢。麻姑说道：“自与仙人相交，已见东海三变为桑田。适才巡蓬莱，见海水又浅，不及往昔一半，莫非东海又将化为陆地么？”王远大笑：“岂不闻圣人言：海中行，复扬尘也。”这便是沧海桑田和东海扬尘两个成语的来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麻姑想见一见蔡经家人。正巧蔡经弟媳刚生完孩子，卧床休息，见客人来，要起床相迎，麻姑挥手止住，吩咐左右拿些米撒在地上，以冲秽气，顷刻间米粒变成珍珠。王远见麻姑耍了些年轻人的小把戏，微笑道：“贫道老矣，神仙游戏年轻人为之！”王远吩咐将仙酒赠送蔡家，又嘱咐道：“此酒原非凡夫可饮，饮之则灼烂肠胃。若欲饮，必以世间水掺之。”于是将一升仙酒兑了一斗水（一斗等于十升）方才解了毒。大家喝得酩酊大醉，犹嫌不过瘾。王远便拿出一千钱，派人去买酒。不一会儿，买酒人抱来一囊酒，约五斗，并传卖酒人的话：“恐地上酒不中尊者意。”

蔡经发现麻姑手指又细又长，形似鸟爪，暗想：“若是后背发痒时，有此爪搔痒，一定很舒服。”王远忽然瞪了蔡经一眼，蔡经便觉后背被鞭子抽打，大惊失色。王远呵斥道：“麻姑神人也，尔怎敢轻亵？”蔡经赶忙道歉，四顾之下不见抽鞭之人。王远笑道：“贫道的鞭子岂能轻易得见？”

邻居前县尉陈某听说神仙降临，敲门求见，纳头便拜，求问修道成仙之术。王远端详良久，叹息道：“阁下心术非正，故身影不端，难以传授仙道。唯些许地



王方平

上术尚可与之。”王远临走时送陈县尉一只小木箱，内有一道仙符和一块木牌，对陈县尉说道：“此中物虽不能令尔度世，却保尔寿过百年。但尔须尽心为善，凡命未及终，或未有罪过者，尔便可持神符至其家中，病将自愈。如妖魔附体，神符无解，举此木牌，可驱遣社神拘收恶鬼。尔要知道所肩重任，随机应变。”陈县尉自此热心治病救人，消灾祛邪，110岁卒。其子孙续用神符神牌消灾驱邪，可一点效果也没有。

王远曾手书致陈县尉，大家因为信的落款方才知晓王仙人真名。陈家将王远所赠之物一书信、神符、木牌和木箱悉心珍藏，作为传家之宝。

栾先生复阳成道

据《乾隆沂州府志》《光绪费县志》等方志记载，两汉时曾有宦者栾先生隐修蒙山，复阳得道，后有紫阳真人周义山前来寻访，遇上古仙人羨门子云云。虽年湮世远，生平事迹不可详考，但史籍教典尚存蛛丝马迹，仍可大致勾勒还原。

蒙山白云岩为明清时北方全真道华山派重要基地，留有大量碑碣铭文，是研究蒙山地区道教文化的重要依据。据道光四年《修白云岩记》记载：“因累古今得道此地者，轩辕帝时有蒙山老人，后有羨门子、列国琴高、汉栾巴、董京威，……”可知《乾隆沂州府志》所云栾先生（府志误为药先生，因繁体字藥、樂相近）即栾巴。

《后汉书》《神仙传》对栾巴都有记载，此人少而学道，不修俗事，汉顺帝年间，不知何故成为宦者，充任黄门令。至于栾巴为何成为宦官，史无记载，参照司马迁的先例，大概因触犯刑律又无钱赎罪，才被处以宫刑。东汉时宦官专权十分严重，气焰嚣张，最著名者如十常侍之乱，透过《三国演义》也可略见一斑。栾巴虽为中官，却洁身自好，不与诸常侍沆瀣一气。大概是学道有成，感动上天，栾巴最后打通阳道，阳气通畅，文雅的说法即玉茎重生，不能再担任宦官。栾巴不待朝廷发现，主动上书请辞，大概因事迹太过稀奇，朝廷并未责罚，不久还擢升郎中。

上元佳节，朝廷君臣会饮，栾巴突然含酒起身，向西南方向一气喷出。礼官大惊，上前叱责栾巴为何如此无礼。栾巴启奏曰：臣之乡失大火，故为救之。顺帝不信，令驿使八百里加急前去探问。不久驿使回报：上元佳节时，西南方向果然有火灾，百姓惶惶之时，忽然从东北方飘来浓云，降下密雨，灭了大火，奇怪的是雨中飘散出一阵酒气。君臣大为叹服。

不久，栾巴见朝政日益腐败，看破红尘，想要前往东方齐地隐居修道，于是敕一道符，化身为狸，悄悄离开朝廷。依据蒙山白云岩碑文及蒙山北麓曾属于齐国的事实，可以推定栾巴在蒙山隐居修道的记载是成立的。

周义山寻仙东蒙

周义山，道号紫阳真人，为道教早期著名道人。据《乾隆沂州府志》记载，他听闻栾巴隐修得道后，亲来蒙山求仙问道，路遇上古仙人羨门子，便向仙人请教成仙之法。羨门子大笑道：道友之名早已在丹台玉室之中，何忧不仙？这段对话很有趣，既有对不知珍惜仙缘、自我努力不足而盲目依赖取巧的揶揄，也有些道在心中、不假外求的意蕴。抛开其神秘主义内涵，此中涵义，似乎对现代世界的人们也有些许启示。

《紫阳真人内传》（出自《正统道藏·洞真部·纪传类》）载：周义山，字季

通，汝阴人，出身官宦世家，西汉丞相周勃七世孙。祖父玄，青州刺史；父秘，陈留史。周义山时年16岁，随父至陈留，开始读《孝经》《论语》。平日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喜好独坐静处，不与他人来往，每天日出之前，东向站立，吞津叩齿，吐纳服气，对日遥拜。一年多后，其父才发现。问他做什么，他回答说喜爱太阳的光辉。每月朔日，周义山便在街市陋巷之中周游，见了乞儿，就送点吃穿。时常独自漫游名山大川，或到石穴之中放声大笑。人以为怪，周义山不以为意。

陈留名士闻其名，都想拜谒，他却称病，谁也不见。侍中蔡成系皇帝亲随，威风显赫，多次求见，都被周义山称病婉拒。父亲不满痛责之，周义山这才勉强出见。蔡成急不可耐的谈论神仙之事、长生之术，周义山凝神静思，点头附和，没有一句答话。蔡成讨了没趣，悻悻而去。

有一年陈留大旱，斗米竟达千钱，百姓濒临绝境。周义山倾尽家财，暗地买米，赈济百姓。这样的善行还有很多。

外乡人黄泰客居陈留，衣衫褴褛，无儿无女，以卖草鞋为生。当时传说仙人瞳子方形，周义山多次暗中观察，见黄泰目亮瞳方，心中暗喜，经常派人买鞋时悄悄留下金银丝帛，赠予黄泰。苦心人天不负，一日黄泰登门求见，周义山连忙请入内室，纳头便拜。黄泰连忙扶起：“闻君雅好仙道，广施仁德，精思妙理，感动上天。我乃中岳仙人，自幼受学于岑先生，习得炼身消灾之道。后遇仇公，传我服气之法、还神守魂之术。仇公荐我于涓子，涓子授我守三一之道，由东海小童君藏之名山，非有仙籍者不能授。小仙观察你良久，知你素有仙缘，故而登门授法。”周义山喜出望外，赶紧再拜，叩问成仙之法。黄泰娓娓道来：“你这么小就知道还阳保精，导引服气，就不必再炼阴丹内术了。只可惜体内三尸毒虫犹未清除，故而修炼不得其法。只要依我之法细细研磨，就可配药杀虫了。”

周义山遵命研服仙药，五年后，身生光泽，能够看穿五脏。于是又寻黄泰仙人，求升仙要诀。黄泰侃侃而谈：“仙药有多种，仙人也分品级。乘云驾龙，白日升天，上仙也；仙卿、仙大夫次之也；能游行五岳，造访太清，役使鬼神者，中仙也；受封一山，总领鬼神者，中仙之次也；食谷不死，日中无影，下仙也；白日尸解，阴界除名，而后乃仙，下仙之次也。我从师涓子，学得秘要，忝列中仙，虽学道不精，然可将守三一之法、灵妙小有之书传授，再赠君以石菌、朱柯、仙乾芝服食。要想更进一步，还请另寻高明。”

周义山千恩万谢。如此勤修五年，便能目视千里，日行五百余里，神清体健，精于隐身之术。于是开始巡游天下名山，求仙问道。闻齐地栾巴修道有成，便东行蒙山，欲向其学《龙蹻经》。偶遇羨门子，被告知他已名列上真，而栾巴不过下仙，哪有上品真人向下品地仙求学的道理？羨门子便将《龙蹻经》《三皇经》倾囊相授，周义山由此学会乘云飞行及劾召鬼神之术。后西登王屋山、嵩山，南登峨眉山、岷山、九嶷山，游历洞天福地，勤修苦练，终于乘云驾龙，白日飞升，受封紫阳真人。

兰陵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

胶水船夫

1973年5月，山东兰陵县城前村发现一座东汉墓葬，出土大量画像石，及题记石柱一处。题记分两石，内容连贯，共15行，计326字。不仅记有明确年代，且对画像石内容记述甚详。对考证墓主身份，确定画像石名称，了解东汉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等均有重要史料价值。

此题记为东汉桓帝元嘉元年所刻。此时隶书已进入鼎盛时期，结字规整，波磔分明，日趋华美，朴拙日消。然细审此题记刻石，字体趋方，已初具楷法，笔墨灵动，书刻自然，无造作之弊。横画左重右轻，厚重而不呆滞；竖笔上重下轻，俏皮而不轻浮。笔断意连，奇趣横生，纵无列而横无行，章法迥异汉碑，开魏晋楷书先河。

兰陵汉画像石题记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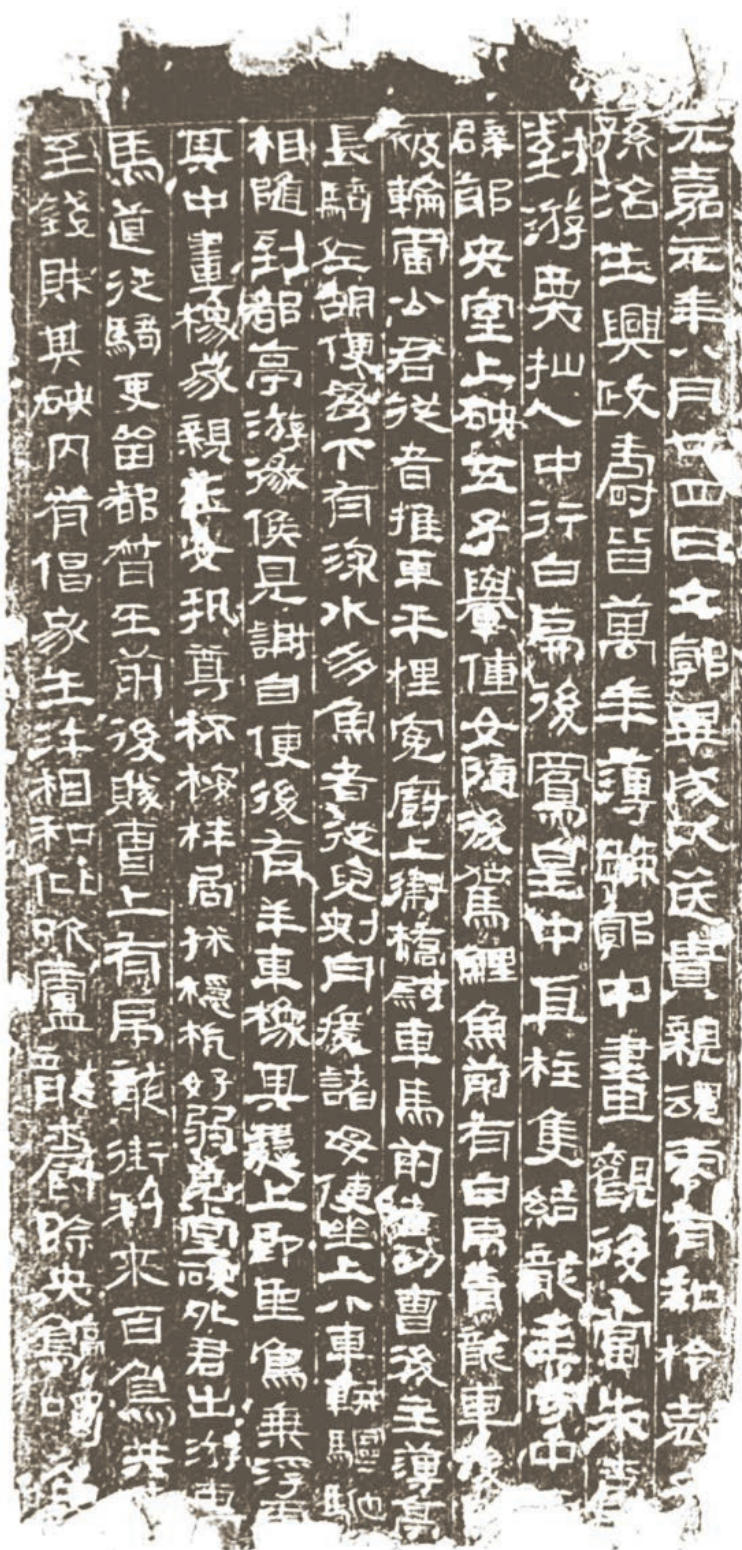
元嘉元年八月廿四日，立廓毕成，以送贵亲，魂灵有知，矜哀子孙，治生兴政，寿皆万年。薄疎郭中，画观后当。

朱雀对游西仙人，
中行白虎后凤皇。
中直柱，双结龙，
主守中雷辟邪殃。
室上殃，五子舆，
僮子随后驾鲤鱼；
前有白虎青龙车，
后即被轮雷公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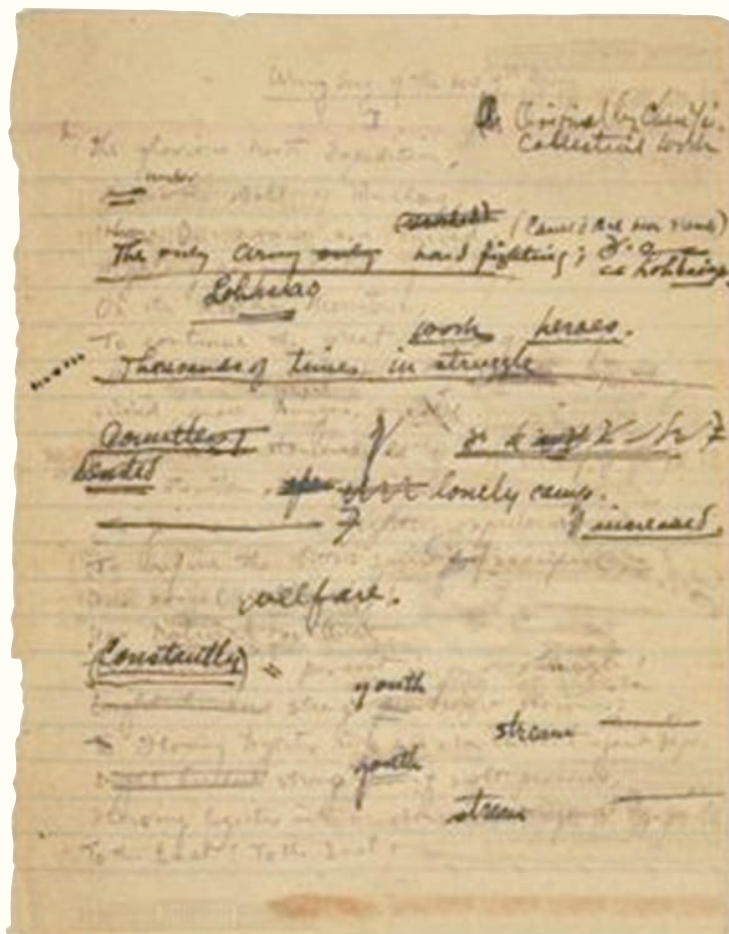
从者推车，平理冤狱。

上卫桥，尉车马，
前者功曹后主簿，
亭长骑佐胡使弩，
下有深水多鱼者，
从儿刺舟渡诸母。
使坐上，小车駟，
驱驰相随到都亭，
游徼候见谢自便，
后有羊车橡其口。
上即圣鸟乘浮云。
其中画，像家亲，
玉女执尊杯案样，
局疎稳枕好弱貌。
堂石央外君出游，
车马道从骑吏留，
都督在前后贱曹。
上有虎龙衔利来，
百鸟共持至钱财。
其石央内有倡家，
生汙相和仇吹庐，
龙雀除殃鷓啄鱼。
堂三柱，
中□□龙□非详，
左有玉女与仙人，
右柱□□请丞卿，
新妇主侍给水将。
堂盖恣好中瓜叶，
上□包末有盱，
其当饮食就天仓，
饮江海。
学者高迁宜印绶，
治生日进钱万倍。
长就幽冥则决绝，
闭旷之后不复发。



抗战歌曲选—— 《新四军军歌》

本 编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939年翻译的《新四军军
歌》英文手稿（现存中国
国家博物馆）

何士德（1910—2000）原名何炳民，出生于广东省阳江
县，1931年入上海新华艺专音乐系学习，他和《洪波曲》
的作者张曙一起在街头演唱，用歌声呼唤民众，满腔热情
地参加上海学生募捐声援东北义勇军活动。1933年入国立
上海音专，师从黄自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法，同时向俄籍
教授苏石林学习声乐。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抗日救亡
歌咏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士德被选为上海
国民抗日救亡歌咏协会副主任兼总指挥。何士德和麦新等
还组成了上海救亡歌咏界战时服务团，帮助做难民工作，
由何士德任团长，麦新和孟波分任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
1937年10月由何士德任团长兼指挥，组成上海抗日救亡歌
咏协会宣传团离沪南下，沿浙赣宣传抗战。1938年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达泾县云岭，担任新四军教导总
队文化队长。1939年5月创作《新四军军歌》，这是何士

德音乐创作的一个里程碑，1939年10月至1940年6月，何
士德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科长。1940年
6月至年底，兼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二团团长。1941年6
月，兼任鲁艺分院办公室主任，8月任军鲁工团团长。1942
年冬，何士德与邵惟、孟波等人在钱俊瑞带领下，到达山
东滨海根据地，休整后，奔赴延安，进入延安鲁艺后任音
乐系教授。1945年4月3日，何士德作为候补代表参加党的
七大。1945年冬，去东北任合江省文工团团长，后又任东
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联合文工团团长。1946年11月，参与
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党总支书记。1947年11月任电影
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兼音乐组长。1953年电影局成立音乐处
任处长。1962年任中国音乐出版社音乐词典编辑室主任，
主要创作有《渡长江》《保卫皖南》《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铁军》《繁昌之战》《反扫荡》《父子岭上》《新四军万
岁》等。其中以《新四军军歌》最为著名。

新四军军歌

陈毅等词
何士德曲

1=C

庄严、雄壮

mf $\frac{4}{4}$ 1 5 3 1. 2 | 3 4 5. 6 5 | 4 3 2 2 3 2 1 | 2 5 3 - |

光 荣 北 伐 武 昌 城 下, 血 染 着 我 们 的 姓 名;
扬 子 江 头 淮 河 之 滨, 任 我 们 纵 横 地 驰 骋;

1 5 3 1. 2 | 3 4 5. 6 5 | 4 3 2 2 3 2 1 | 2 5 1 - |

孤 军 奋 斗 罗 霄 山 上, 继 承 了 先 烈 的 殊 勋。
深 入 敌 后 百 战 百 胜, 汹 涌 着 杀 敌 的 呼 声。

f 6. 6 6 4 3 | 5 - 5 0 | 4. 4 4 5 4 | 3 - - 0 |

千 百 次 抗 争, 风 雪 饥 寒;
要 英 勇 冲 锋, 歼 灭 敌 寇;

6. 6 6 7 | 1 7 6 6 7 | 1 7 6. 7 | 5 - - *p* 3 5 6 7 |

千 万 里 转 战 穷 山 野 营。 获
要 大 声 呐 喊, 唤 起 人 民。 发

1 0 1 1 1 1 4 | 3. 2 1 *mp* 3 6 7 1 | 2 0 2 2 2 2 5 | 4. 3 2 3 4 |

得 丰 富 的 战 争 经 验, 锻 炼 艰 苦 的 牺 牲 精 神, 为 了
扬 革 命 的 优 良 传 统, 创 造 现 代 的 革 命 新 军, 为 了

mf 5. 5 5 4 5 | 6. 6 6 6 6 | 5 - 6 6 | 5 5. 5 6 7 |

社 会 幸 福, 为 了 民 族 生 存, 一 贯 坚 持 我 们 的 斗
社 会 幸 福, 为 了 民 族 生 存, 巩 固 团 结 坚 决 的 斗

f 1 - - 1. 1 | 1. 7 6 5 4 5 | 6 6 6 3 3 1. 1 | 6. 5 4 3 2 1 |

争! 八 省 健 儿 汇 成 一 道 抗 日 的 铁 流, 八 省 健 儿 汇 成 一 道
争! 抗 战 建 国 高 举 独 立 自 由 的 旗 帜, 抗 战 建 国 高 举 独 立

mf 3 3 3 2 5 0 5 5 0 | 1 1 1 - 5 5 5 | 1. 5 3 1 5 0 6 6 0 | *f* 2 2 2 - 6 6 6 |

抗 日 的 铁 流。 } 东 进, 东 进! 我 们 是 铁 的 新 四 军! 东 进, 东 进! 我 们 是
自 由 的 旗 帜。 }

ff 2. 1 7 5 1 0 1 1 0 | 3 3 3 - 2 2 2 | 3. 1 2 3 | 1 - - 0 ||

铁 的 新 四 军! 东 进, 东 进! 我 们 是 铁 的 新 四 军!

1939年5月作于安徽皖南新四军军部。

沂河桥的故事 (中)

本 编



上世纪70年代的金雀山路沂河大桥



1983年12月，紧挨低桥建设的金雀山路沂河公路大桥通车

金雀山路沂河桥

为缓解沂河老桥的交通压力，1963年6月，新沂河桥开建。到1964年8月建成，名为“临沂沂河大桥”，桥长1402米，宽8.5米，高4米，成为当时全省最长的公路桥。

1983年12月，紧挨着该桥建设的第三条穿越沂河两岸的公路桥建成通车，大桥长1553.94米，宽11.5米，高8米。由于这座大桥与沂河大桥并驾齐驱，所以被统称为沂河高低桥。《中共临沂历史大事记》中这样评价：“沂河大桥的建设对于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兖石铁路和石白港建设，发展临沂地区经济以及加强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编二十五、六十四、九师向南麻迅速靠拢，华野司令部连战前作战会议都没有举行，就仓促令各部于7月17日分路开进。就在这一天，突然下起了暴雨，各部的行动一时受阻。一直到黄昏时分，二、六、九纵才完成对南麻整编第十一师的战役包围，而七纵负责打援。

这种大兵团作战而采用游击队战术的方式，可以说，从战役的一开始就注定了过程的艰难。

战役中，粟裕给予九纵的任务是由西、北两面进攻，其中以—个师在南麻与西面的鲁村之间，截断敌人向西的退却路线，同时向东控制田庄、北埠东以北方向的高地，主力则由三岔店向北麻、南麻发起进攻。

此次战役中，粟裕副司令员担当了战场指挥员的责任，而且亲自到达前线进行指挥。还是看同一个回忆录里面的记载：“战后，聂副司令员对我说：“瞎子（指孙同盛，因近视眼而得名），华野粟裕副司令员表扬你们了，当时粟副司令员在山上观察，他说：‘整个南麻全线战况沉寂，惟有第七十三团方向战斗激烈，敌十一师集中了全军的炮火都倾泻在第七十三团阵地上，第七十三团打得英勇顽强！’这一评语确是第七十三团高庄两山反击战的真实写照。”

战斗进行得极其激烈，敌我双方都在拼命想给对方以致命—击，而即使许世友不在前线，其所任司令员的九纵，仍然对于华野总部的命令执行得极其坚决，战绩尤为突出。他们从西北攻击南麻，于18日凌晨攻占了荆泉山，随后攻克了高庄西北，由十八旅工兵营把守的阵地——崮山高地。

时任国民党军整编十一旅旅长的杨伯涛在回忆录里面写道：此山被攻占后，“形势顿形改观，全旅南、西、北三面暴露，解放军可以三面围攻，该旅就受制于敌，没有机动余地，形势极为不利。”

所以，“胡（胡璉，时任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师长）作出决定，指示该旅尔后作战准则。胡认为该旅工兵营长，没有克尽全力，贪生怕死，擅自逃跑，放弃阵地，罪责极为重大。整第十一师开战以来，从未发生这样事件，此例实不可开，为杜绝后患，绝不能宽容。临别时，胡璉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命覃道善（国民党军十八旅旅长）宣布师长命令，处工兵营营长死刑，立即执行！”

这也是国民党军在南麻战役中唯—一个因为丢失阵地而被枪决的将领。

此后，十八旅全旅拼死防守。王必成指挥的六纵从南面攻击南麻，但遭到强烈反击，伤亡很大。

之后，杨伯涛再次发现了“主力”的动向，但是他提到的，其实还是九纵进攻的方向：“我们发现解放军利用西北角高地为夜间进攻基地，白天收缩隐蔽，入夜出发进攻，进退自如。”

在杨伯涛回忆录里面，竟然如此之多的提到九纵的进攻路线与方向，可见九纵进攻之凌厉给敌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与孟良崮战役中敌人的错误判断—样，九纵的方向，就是主力的方向，而且这个局面—直延续，不能不说是许世友将兵与将将的成功，也是—个主帅在自己部队里面战斗作风的传承。

另外，杨伯涛的回忆录里，仍然—如既往地说：“陈毅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以南麻久攻不下，徒耗兵力……”

不过，九纵作为解放军的非主力，在敌人中却认为是大大的主力，九纵进攻的方向也就成了敌人重点防范的方向，所以，九纵的伤亡也就相当巨大了。九纵主力中的主力的十三团（七十三团）在战斗过程中，就连当时担任三营总支书记的迟浩田，也被迫组织并带领营部的勤杂人员上了火线，并身负重伤。可见敌人对九纵的重点防范，更可见我军的英勇与战况的惨烈。



我军的进攻相当猛烈，而敌人的反应也相当迅速。

就在敌军为了阻止九纵为主的我军展开的进攻时，7月20日，王耀武给在潍县驻防的整编八师下达了南进的命令：“匪三个纵队围攻南麻甚烈，希速率整八师主力先攻临朐而占领之等谕。务须迅速行动，如稍延误，恐受极峰责罚。除分电外，特电遵办具报为要。”

7月21日，蒋介石再次亲自下达积极增援南麻的命令：

“增援南麻之电令，想已到达。再将下意着王副总司令叔铭口头纪录空投转达，务须切实遵行勿误。接信后盼复。但应守极端秘密而行动，更要秘密与迅速，以达成任务，是为至要。

应注意事项：

1、前进时应与空军切实联络，使其掩护，遇有匪阻碍时，应陆空军协同一致扫荡之；

2、后方基地粮弹行动不便时，空军可投送，不可为粮弹辘重延误时机，应轻装速进；

3、前进时道路之两侧五十公里以内，应派有力部队为左右侧卫，先行搜索前进，并须加强后卫力量。”

在各个战线上的国民党部队也同样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为了防范孟良崮战役的战局再次出现，各军迅速出动，从四面八方扑向南麻一线，企图再次实现中心突破的战术。

而国民党整编六十四师师长黄国梁也下达了坚决的增援作战命令：

“一、师当面之匪情如参处通报。其二、六、九纵队及七纵一部，两昼夜以来，连续向我南麻十一师围攻甚烈。我廿五师主力本廿日晨在本师后续进，预定超越攻击，进出九顶山，与十一师会师。

二、师以应援十一师战斗之目的，决即击破当面匪军，迅速进出九顶、连环山之线。



三、一三一旅除留一部（约一营）扼守韩望崮、凤凰崮、龙望崮等要点向东警戒外，主力应于本计日拂晓开始行动，迅速击破当面匪军后，进占东九顶、连环山，以后行动候命。

四、一五六旅应于本什日拂晓开始行动，迅速击破当面匪军，进占西九顶、连环山，以后行动待命。

五、一三一旅、一五六旅之战斗地境，为娘娘顶、卢峪、胡庄、东九顶、连环山之线，线上属一三一旅。

六、有线电以娘娘顶为基点，构成师旅间通信网，师旅间无线电通信，七时后每隔一小时联络一次。

七、师野战医院应于战斗开始后，在杜庄开设。

八、师指挥所本廿日十一时后，位置于娘娘顶南麓社庄。”

在黄国梁的严厉督促下，该师的一五六旅于7月22日拂晓，率先到达中马头崮一带，与南麻的整编十一师会师。而从沂水出发的整编第九师也于21日下午，到达悦庄以南一带。从潍县出发的李弥整八师部队也到达了接近南麻地区的临朐县附近，并与我军展开激战。一时间敌人的各路援兵纷纷接近。

在经历17日到21日连续五天的激战后，由于国民党整八师、二十五师、六十四师的迅速增援，战场形势已经不利于我军的进攻作战，我军二、六、七、九纵均在21日晚主动撤出战斗，于23日晚转移到了临朐以南、马站崮东、垛庄以北的地区，以便寻找再次歼敌的机会。

由于南麻战役没有达成基本的战役目标，也就是既没有攻下敌人的据点，也没有重创守军，后来此类战役被称为“消耗战”。

无可否认的是，即使被称为“消耗战”，这场战役给华野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无法掩盖的。

从高级指挥员来看，华野二纵五师的政委秦贤安、六师十八团的副团长胡大炳、四师的组织科科长魏自强等，在激烈的战斗中牺牲。参战四个纵队之一的七纵，其司令员成钧在去前沿阵地指挥部队同敌人争夺山头时，被敌狙击手击中，身负重伤。

从战果看，按照我军的统计，敌人被歼大约一万人左右，而我军也付出了同样一万多人的代价，伤亡基本相同。但是按照后来打扫战场的国民党军的统计数字，以



及后来的回忆录看，则我军的损失在1.5万人左右，而敌军的伤亡约在8000人上下。从我军高级指挥员大量受伤与牺牲的情况看，后者的统计数字有一定说服力。

就担任主攻的九纵而言，南麻战役造成的损失，在参战的各个纵队中，无疑是最

大的。

战后，“高庄西山战斗，第七十三团伤亡严重，各连营步兵伤亡三分之二，战后全团共编成六个连，其中仅有4个连能战斗，还有2个连系师团机关勤杂人员组成，不能参加战斗。”（《孙同盛回忆录——回忆战争》）

整个九纵的伤亡人数，达到了4600百多人之多。这与孟良崮战役的伤亡情况，基本接近，但是缴获却少了不少。

南麻战役的失利，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此次战役的失败是七月分兵造成的兵力过少造成的，但是前面我们提到，此次战役，我军动用的兵力与敌人守卫南麻的兵力对比达到了4:1，因此这不能是一个理由。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我军将士的作战极其勇猛，是不可指责的，因此也不能把失利责任推到基层将士们身上。

我觉得，作战目标的更改过于频繁，作战部队的出动过于仓促，应该是原因之一。而在战役指挥上，参战各纵队之间缺少战役上的配合，仍采取了孟良崮战役时无作战主要方向的人海战术来对抗力量集中使用的国民党军队，是指挥上的重大失误。

南麻战役后，我军由于仓促撤出战斗，不少重装备被迫舍弃，由于伤亡严重，不少基层连队也已经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尤其在持续多日的连续昼夜进攻后，我军已极度疲劳。因此，这种形势势必给下一步的所有作战行动，造成重大影响。

但是，与我军战役指挥上重大伤亡比较，敌人却在战后相当悠闲。杨伯涛回忆录里面，关于战后到济南游玩的记载，很能说明此时敌人的心态：“王耀武为了酬劳我们，特邀请胡璉和我等数人，到泉城济南游览。受到王的盛宴款待，并遍游名胜古迹。我在趵突泉，但见滚滚清泉从地内涌出，滔滔不绝，浪花翻跃，千恣百态，令人心旷神怡。用泉水烹茶品茗，更饶清香。大明湖碧波万顷、亭台掩映、轻舟击棹，如履太虚仙境。”

骄纵的敌人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其癫狂之态，似乎是何等惬意啊！

但是，我军则在此战后仅仅几天，在未获得补充与哪怕是适当休整的情况下，就又踏上了再次血战的路程，那就是临朐战役。

盲人信使程贵超： 义务为乡亲送信43载

符丹 叶勇 陈海芸



他双目失明，却坚持为村民义务送信、送报43载；他靠着一根竹竿，用双脚丈量过全村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为了让信件、报纸送达每一户，他常常掉进河里、撞到墙上、被石头绊倒；他的脑中已渐渐形成了一张全村的“地图”；他还是村里的义务调解员，帮助村民化干戈为玉帛……他就是莒南经济开发区南石桥村义务邮递员程贵超，43年间，数十万信件、报刊，经过程贵超的手一一送到了村民手中。

幼时失明，义务送信40余载风雨无阻

程贵超，今年60岁，双目失明。自1972年起，他开始义务为村里送信送报，今年已经是第43个年头。

程贵超两岁时因发高烧导致双目失明。虽然自幼眼睛便看不见，但他却一

直想“做一点真正能帮助别人的事”。1972年，程贵超刚刚16岁，当得知邮局送来的信件都放在村大队办公室，村民因为忙农活等原因不及时领取有时就会耽误事，他便向村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帮乡亲们把信件送到家。

村里对程贵超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了，他毕竟是一名盲人，能够自己照料好自己的生活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更别说帮助村民送信了。对于这一想法，村委工作人员将信将疑……不过程贵超再三表过决心后，村里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之后，程贵超在义务送报员的道路上一走就是43年，并且还将坚持下去。

“俺能为村里做的不多，这份差事俺一定得干好”

就这样，程贵超正式成为村里的义务“投递员”。每天上午，在村委大院，邮政局的邮递员送来全村需要投递的报刊、信件后，把所有报刊、信件的收件人一一告诉程贵超，再按照顺序把这些报刊、信件一份份依次排好，装进程贵超的背包里。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程贵超一天的投递工作就开始了。

对常人来说，送信送报是一件微不足道，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对于双目失明的程贵超来说，这是一件充满重重困难、甚至危险的事情。

在刚开始的几年里，由于村里道路坑洼不平、房屋排列无序，程贵超没少受罪。掉进河里、撞到墙上、被石头绊倒是常有的事，胳膊上、腿上、脸上经常旧伤未好又添新伤。最严重的一次，他到村民家查一封重名信，被铁门的门鼻撞伤了眼睛，血顺着脸直往下淌。好心的邻居们把他送到县城的医院打了两天吊针，他回家又躺了20多天才好。

为了避免程贵超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村委工作人员和村民都劝程贵超别干了，可他却憋着一股子劲头决不放弃：“俺能为村里做的不多，这份差事俺一定得干好。”

摸一下门环，就能准确说出哪家哪户

就是靠着这一股子韧劲，程贵超没有停下脚步。村里的角角落落，大到一间房，小到一棵树，都被他用脚一遍又一遍地“量”过。渐渐地，他的大脑里形成了一幅无形的“地图”。哪里是沟、哪里有河，程贵超都能用大脑的记忆“看见”。凭着记忆和感知，他就能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摸一下大门上的门环，程贵超就能准确地说出这是哪家哪户。

43年间，数十万信件、报刊，经过程贵超的手一一送到了村民手中。程贵超送信送报，总是认认真真地把每一封信、每一份报刊稳妥地当面递到村民手中，决不因为村民家里无人把信件往门缝里一塞了事。为了将信件、报刊当面送交到村民手中，程贵超有时一天要往一个村民家中跑两三趟。全村700多户人家，谁家订了什么报刊、谁家外出的孩子经常来信……程贵超如数家珍。

“能为村里做点事、出点力，就证明俺这辈子没白活”

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近几年村民订阅信件、刊物有所减少，但是程贵超仍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义务“邮递员”每天不变的工作。后来父母双亲也去世了，程贵超在打理好自己的日常生活、送完信件、报刊后，还主动配合村两委做起来邻里纠纷



调解和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

邻里之间、村民之间发生了小纠纷和小矛盾，程贵超不厌其烦的做起来调节工作，经常这家说一说，那家说一说，跟村民讲道理、解思想疙瘩。大多数情况下，村民看到程贵超用他的竹竿摸索着去做调解工作，都会主动参与进来进行调解，当事人往往也是羞愧难当，最后大都握手言欢了。

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基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程贵超利用送报、送信，进行矛盾调解的机会帮助村两委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帮助大家树立健康的婚育观念。

程贵超几十年间默默无闻的耕耘，从不问收获，不计得失。莒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给予了程贵超多方面的帮助，上级有关部门也给予了程贵超很多荣誉，他曾被评为全县十大杰出青年，省、市残疾人先进个人，全省、全国“自强模范”。程贵超还代表残疾人参加过省残疾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面对荣誉，程贵超一如既往的平淡，他说：“能为村里做点事、出点力，就证明俺这辈子没白活。”

候选之国医大师

——记刘启廷

刘凤才



2014年中医药特色打造年暨拜师大会与赵爱华副市长在一起

《黄帝内经》曰：“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隐，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故动则有成，犹鬼神幽赞，而命世奇杰，时时间出焉。则周有秦公，汉有淳于公，魏有张公、华公，皆得斯妙道者也。咸日新其用，大济蒸人，华叶递荣，声实相副，盖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

感谢我们一辈辈祖先的哺育，使我泱泱华夏、绵绵杏林“江山代有人才出”。在古琅琊之地，在当今沂蒙，同样也出现了一个杏林“风云人物”——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临沂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刘启廷。2014年，刘启廷又以其卓越成就与突出贡献，入选第二届国医大师候选人名单。而“国医大师”，是今天全国中医药界的最高学术称谓，屈指可数，享有殊荣；国医大师候选人，亦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这是刘老先生的个人荣誉，也是沂蒙山区的骄傲。

一、名扬大报的“小医生”

“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最好的医生”，这还是刘启廷早在少年时代就立下的志向。而从17岁正式开始从医生涯，到今天成为一位“国医大师候选人”，

66个春秋，又似弹指一挥间。面前的刘启廷老先生，已是耄耋之年，却毫无老态龙钟之相。除了步履略显迟缓，他童颜鹤发，皮肤白皙，面泛红光，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言谈条理，记忆清晰。提起六七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是如数家珍。

1933年10月，刘启廷出生于安徽省宿州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天资聪颖，从小又受到良好家教，孝道、仁爱等等这些美德理念，在他身上渐渐得以养成与体现。可是少年时代，家里的“顶梁柱”、年富力强的父亲，却不幸患上了肝硬化病，备受疾病折磨。看着父亲那痛苦不堪的表情，他不时转过身去，悄悄地抹一把两眼清泪。从十几岁时，他就经常陪着父亲四处奔波，求医问药。那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极为落后。看到无数像父亲一样的重症病人得不到有效的医治，他小小年纪的心中就逐渐充满了与他的年龄不相仿的遗憾，也咬牙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向古人那样，头悬梁、锥刺骨，好好学知识、做学问，长大后当一名具有真本事、大本事的好医生，为父亲那样的病人看病治病，解除痛苦。

机遇属于有志者。对于刘启廷，人生的机遇来得似乎稍早了一些，但是这更让他喜出望外。

1950年，他刚刚17岁，正在徐州第五中学上学。他学习用功，成绩优异，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他的学习目的也相当集中明确：矢志不移，将来当个好医生。恰在这年10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在中原、华东大地，一场规模宏大的“新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百万民工治理淮河。治淮战场都是在田野荒地之间，医疗卫生、防疫治病至关重要。治淮委员会各下属单位都成立了卫生所。卫生人才奇缺，便到各地在校中学生中招考卫生防疫学员。老师问刘启廷：“愿意不愿意去学医？”这正中刘启廷之下怀，他不假思索，立即干脆坚定地回答：“愿意！”于是，他顺利通过了考试，成了治淮委员会卫生培训班的一名学员。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中西医基础知识、工地救护知识、卫生防疫知识等，掌握了许多基本功。半年后，他被分配到本区民工大队卫生所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从医之路。

卫生所原来只有两位医生，人手虽少，倒是一中一西、中西结合，而且两位医生都有较深“道业”，中医经验丰富，西医曾是军医，近水楼台，机会难得，刘启廷主动自觉地把他们当成了老师。一般情况下，两位医生在家坐诊，刘启廷承担起奔野外、跑工地、搞防疫、问病情、发药品等众多任务。他尊重服从老医生，腿脚勤快，吃苦耐劳，起早摸黑，不怕流汗出力，尤其是他心地仁爱，热衷医道，又聪明伶俐，勤学好问，肯于钻研，乐于助人，热情服务，很快赢得了两位老师和广大民工的喜欢和信任。特别是老中医，更是把他看成了“入门弟子”，认定这个小伙子是可造之材，将来必定能承担大任，对他“不吝施教”，热心传授技艺。老先生对刘启廷说：“孩子，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急用先学、先学急用’。野外施工，都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最常见的病多是些急症，如跌打扭挫、风寒发热、腹疼肚泻等。我先教你学会‘马丹阳十二针’，保证手到病除，治病救急。”

“马丹阳十二针”，是在宋元战乱年间，道人马丹阳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下，用针灸为难民治病、并由他总结著作而成《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用这12个穴位可以治疗全身疾病，特别是治疗急症，简便易学，疗效显著，甚至可以收到“治病如神灵，浑如汤泼雪”之明显效果，而且这些穴位都在人之手脚，只要按正常针法，不会出生命危险。

刘启廷如获至宝。老师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他心领神会、聚精会神地学，很快便把“十二针”烂熟于心，掌握在手，加上他胆大心细，又很快运用到给民工治病上，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当时，民工队伍十分庞大，一个大队就有数千人，患有临时急症的不在少数，今天你伤风，明天他扭伤，工程任务又十分艰巨紧迫，病号都不

愿意跑大老远的路去卫生所。为了及时给伤病员们解除病痛，刘启廷就背上挎包，装上银针，在各个工地中间来回穿梭，进行诊治。开始，人们对这个一脸稚气的“大孩子”只凭一根小钢针究竟能不能治病还满怀犹疑，但是几针下去，疼痛立消，力气恢复，立即又能抬土打夯了，大家对刘启廷当即刮目相看，伸出拇指。时间不久，“宿州大队卫生所有个‘小神医’，一根银针手到病除”的消息就传遍了各个工地，来找刘启廷看病治病的竟有点络绎不绝的阵势。而刘启廷对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神奇功效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刘启廷在治淮战场上行医治病3年多后，名声也越来越大。1953年的一天，宿州卫生局长亲自采访他并撰写了一篇报道《活跃在治淮工地上的小医生》，发表在《安徽日报》上。从名不见经传到一下上了省报，刘启廷的名字从此被全省众多民众和业内人们所知道。这更加激励与坚定了他努力进取、实现当一名最好的医生的信心与决心。

就在这年，刘启廷被调到治淮委员会第二施工总队医院工作。过了两年，医疗系统进行工资调整与定级，对这个学的是防疫员、干的是中医、又兼作护理，叫干什么干什么，哪里需要哪里去、上了省报有了一定名望的“多能青年”，到底按什么给他定职位、定工资、定级别呢？院领导颇费了些考量。最后，决定给他安排一个“护士长”的头衔，工资待遇等同医生。而刘启廷则根本不考虑个人名利得失，一门心思用在为病人治病上。虽然成了总队医院的“护士长”，他的第一战场仍然在治淮工地，他的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战斗在最艰苦的第一线的广大民工。他风来雨去，披星戴月，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常常是在患者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在广大民工中的“人气指数”也越来越高。

1956年，刘启廷被评为安徽省卫生先进工作者，光荣地出席了在合肥召开的全省表彰大会。

就在他已经开始在杏林中崭露头角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从医之路，从中原大地延伸到了沂蒙山区。

二、开拓沂蒙山中医事业的孺子牛

刘启廷的爱人既是他的同村，也是他事业道路上的伴侣。

他爱人1953年考入山东省济宁护校，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沂水县人民医院工作。这在当时，对各地医疗机构来讲，都是难得的高学历人才，沂水县人民医院当然牢牢地抓着不放，夫妇二人又不能长期分居两地。沂蒙山区以自己招贤若渴的期待和宽大广阔的胸怀，热情地接纳了杏林青年才俊刘启廷，他被调到临沂地区人民医院工作。

当时，或许许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位新来的青年人，将来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沂蒙山区这片红色沃土中医药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成为一名国医大师级的最重量级人物，刘启廷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当时临沂地区人民医院还没有设立中医专业，没有专门中医门诊，他在安徽的职务是护士长，医院领导就让他先到急需人手的手术科做助手，一年后又把他调到了医务处。已经是一名共产党的刘启廷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是那时人们恪守的政治纪律，“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是共产党员的不二选择。在手术科和医务处，他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工作，而且干得得心应手，同样出色。

刘启廷中医事业的第二次机遇，来自1958年。为了发掘、保护、发展、振兴祖国医学，壮大中医事业，医院成立了中医科。对此，最激动与振奋的当然是刘启廷。

有了中医科，他就有了新的希望，不但可以成为他一试身手的平台，而且可以作为自己学习深造提高的殿堂。但因为工作在医务处，他只能把满腔的期望暂时悄悄地隐藏在心底。

当时，临沂地区的中医药人才资源本来就很稀缺，又都散在于民间，大多独行江湖。尽快把这些人才资源的基本情况调查清楚，把其中的能人高手召集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中医科的中坚骨干，是成立中医科的根本基础，也是当务之急。这项任务，恰恰由医务处负责，而刘启廷本身就是中医，所以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他急如星火，风尘仆仆，下到各县，深入乡村，遍访民间，寻找线索，直找本人，加之各地比较优秀的中医都在坊间有一定名声，所以在很短时间里，就基本上了解、掌握并结识了全地区的中医药主要人才。经过医院筛选，把最优秀的七八位地方名医调到了地区人民医院，其中，时年已经70多岁的沂南马牧池乡的高金藩先生名望最大、医术最高，刘启廷对老先生充满了敬佩羡慕之意，心想，要是能成为高先生的徒弟，那真是近水楼台、如鱼得水了。

医院领导似乎早就看透了刘启廷的心思。中医科刚刚开张，就把他找来谈话：

“小刘呀，我们的中医科算是正式成立了，你不是一直信奉名师出高徒、想跟着高师学中医吗？医院就决定调你去中医科工作，做高先生的徒弟，还要担任中医科的党支部书记。你是既要当好学生，又要当好领导呀，怎么样？”

喜从天降，刘启廷忙不迭地连声回答“是、是，好、好！”

高先生曾经多次参加当年沂州府的秀才州试，文化底子厚，医道理论精，实践经验丰富，造诣很高深，治学很严谨，带徒很严格。尽管刘启廷身为党支部书记，但是在教医上，他只把刘启廷当作一名弟子来对待，从医理教起，以医案示例，言传身教，一丝不苟。刘启廷自知没有受过系统完整的中医理论教育，尤其是基础理论是“短板”，便抓紧一切时间，进行知识学习。好马不用扬鞭，响鼓不用重锤，白天他跟随老师门诊学习临床诊疗，晚上便加班加点、挑灯夜战作总结。在几年时间里，他几乎牺牲了一切节假日和休息时间，把整整10部中医经典熟读了数遍，重要理论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他是从干中学、学中干起步的，有了扎实的理论功底，有了中医科的平台，有了老先生们的实际示范，他进步迅速，一步一个台阶，很快成了名符其实的



国医堂坐诊

年轻中医“先生”，找他求医问药的患者也纷至沓来。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时，他被选为临沂地区卫生战线的唯一一名代表，赴省会济南参加了国庆10周年大庆的观光典礼。

正当他在中医事业上干得风生水起、顺水顺风时，1976年初，他却被医院重新调回了医务科。虽然提拔任命他为科长，但他还是大惑不解：难道自己真的不适应从事中医？难道自己酷爱的中医事业、好不容易闯出的医学道路就此中止？

时隔不久，他的疑惑便有了答案：是年6月，临沂地区决定正式成立一所地级中医医院，以后定名为“新医医院”，之所以如此定名，是为了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指示精神，建设一座以中医为主、中西兼顾的新型医院。后来为突出祖国医学特色，又更名为临沂市中医医院。这是临沂历史上最高层次的一所中医医院，是沂蒙山区中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刘启廷被委以重任，担任“新医医院”筹备建设领导小组的四成员之一，担任主管业务的副院长。

原来是有更加崭新而光荣的责任在等待他，一副更加艰巨而重要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

此时，中医院的基本建设工作已提前进行，第一批分配到医院的毕业生已报到，但是医院主体大楼还在进行“扫尾工程”，而且除了大楼框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空荡无物，各种必需的门诊医疗设备、仪器、办公用品等，一无所有。员工宿舍更是无从谈起，毕业生们只得借宿于邻近单位的库房中。面对此种情状，有的领导主张医院推迟到翌年开张。但是刘启廷坚持认为：目前社会上对中医医疗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推迟了，但是那些急需治疗的患者不能等，新院早一天开张，就能早一天为广大患者服务。事在人为，没有条件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早一天开张。他主动承担起了筹办基本办公、诊疗设施设备与条件的任务。在他的组织领导和带动下，员工们加班加点，日夜不停；同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药橱，就弄几张简易床擦起来，把药材分类包好，标上标签；化验室设备暂时不齐全，就跑到人民医院送检等。到这年年底，竟然魔术般地做好了一切必要准备，超预期开张了。

建院伊始，上级给中医医院定位是：医、学、研相结合，三位一体，办成为患者服务、为培养中医人才服务、为中医基础研究与创新服务的基地。实现这一目标，作为业务副院长与专业带头人，刘启廷自然是责无旁贷。自此，他开始了开创沂蒙山区中医药事业新局面的新征程。

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仍然是中医人才特别是新生人才、后备人才匮乏。有了培训基地，缺少师资又成了问题，单靠本院现有专家教学，无疑是杯水车薪，何况他们都承担着繁重的门诊临床任务。为此，刘启廷放开眼界，决定在全地区范围内考核选用一批专业强、医德高、有一定资历的中医作为师资，共选调了6名，都堪当重任。在他的主导组织下，医院先后举办了若干期培训班，其中既有“提高班”，也有“新生班”，既有单科班，也有综合班，既有中医班，也有中西医结合班，总计轮训3000多人，基本上把当时全区从县区到乡镇的中医人员培训了一遍，为促进全区中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每期培训，刘启廷都亲临课堂，亲自授课，言传身教，不遗余力。直到今天，他只要在全市中医系统走一趟，很多人仍然尊敬而亲切地称他为“老师”，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怎样发展扩大医院的业务上，刘启廷更是煞费苦心，殚精竭虑。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在华夏大地上涌动。刘启廷思想敏捷，认识敏锐，认为中医虽然是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是要跟上新时代步伐，也必须与时俱进，放开眼界，更新观念，走出家门，学习先进，不断提高。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大众，也才能使中医事业获得长足进展。在他倡议下，医院组织各科室负责人，组成一支考察

学习队伍，由他带领，一路南下，从沂蒙山区直到广东沿海，沿途共参观考察了20多所省、地级中医院，取得了不少“新经”“真经”，为推动本院的改革开放事业，开创了一个良好开端。

上世纪80年代后，为解决很多被“文革”耽误了10年的中医人才的学历问题，全国开展了中医自学考试。刘启廷又被地区卫生局委以负责自学考试工作的重任。在他主持下，全地区共有3000多人通过了单科考试，综合类毕业生达到400多人。1995年，他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助学个人。

刘启廷对沂蒙山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利用临沂中医学会这个平台，联络组织培养发展了一批优秀中医人才。1979年，临沂地区中医学会正式成立，刘启廷被推举为秘书长；退休后，他继续担任学会理事长3年多时间。他不但利用自己的影响与威望，吸引与团结了一批中医人才，还策划创办了《沂蒙中医》这一学术刊物，而在当时，这样的地区级学术刊物还不多见。他引导会员们打破传统观念，放开眼界与思想，树立“只有开放、才能交流，只有相互学习、才能共同提高”的理念，积极踊跃地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与经验。在他指导下，刊登了许多有份量、有价值的中医医学文章，在推动全地区中医学术交流、提升中医理论层次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沂蒙中医》也被破例列入了《中国医药年鉴目录》。

今天，沂蒙山区的中医事业，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如日中天。看到这样一片大好势头，再蓦然回首往事，业内的人们都不由发自内心地一句赞叹：“这一切，都离不开刘启廷这位开拓沂蒙中医事业的孺子牛！”

三、学术理念与实践创新的领军人

从17岁步入中医的门槛，到退休后又被医院返聘，再到今天以83岁高龄仍然坐在中医的殿堂，66年间，刘启廷尽管从事过医务、政务等工作，但他一直坚持在中医医疗的第一线，一直没有离开过门诊与临床。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在继承传统中医药科学上功不可没，而且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时有突破，不断建树，让人耳目一新，为中医药事业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不同凡响的重要理念与实践主要有：

其一：“中医无病不治论”。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中医专家，刘启廷经常面对患者特别是一些身染重病者相同的提问：“大夫，我这病到底能不能治？”每当此时，刘启廷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能治，中医无病不治！”望着患者那一双双充满了安慰与期待的眼睛中重新放射出希望之光，刘启廷更加自信与坚定。

或许有人认为刘启廷太“牛”，但这决不是“大话西游”，也不是夜郎自大。刘启廷有充分的理由。一是从医生的天职讲。《黄帝内经》曰，医道乃是“精光之道，大圣之业”。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如果你连句“这病能治”的话都不敢说，那还坐在医生的位子上干什么？既然坐在这里，就必须敢于面对各种病患大声地宣言：你没什么了不起，我肯定能征服你！同时，这个观念也能促使医生增强责任感，坚定攻克病患难关的信心与决心，激励、促使你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二是从中医本身的价值讲。中医药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粹”之一。上下五千年，中医药之所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而且不但为国人、还为全世界不断所认识、认可，肯定有它的独特优势，有不可估量的医学价值，是攻克人类各种病患的有效利器。正如《黄帝内经》所言：“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三是从患者角度讲。“治病三分靠医药，七分靠精神”“精神不垮、无病能攻”，是中医治病理念的

核心与基础之一，也是刘启廷时常强调的观点。医生一句“这病能治”，就能给病人以极大的鼓励与希望，使之挺立起精神支柱；一句“这病不好治”，可能就给病人以极大压力；而一句“这病不能治”，就等于宣判了死刑，病人必定不治自垮。我们医生，有什么权力说“这病不能治”？四是从治疗的实际效果讲。人总是要生病的，人的寿命总是有限的。即使是得了所谓公认的“不治之症”，如果能最大程度地解除患者痛苦，如果能在保证其生存质量的前提下让其多存活哪怕是一天，也不能说是“不治”，“能治”是绝对的，“不治”是相对的。在这一方面，中医更是有着独特的优势与强项。总之，“中医无病不治”这个理念，用刘启廷的另一句话说就是：“作为一个医生，一方面要有救人救命之仁心，另一方面要有治病克难之胆量。心一定要仁，胆子一定要大。两个方面都具备了，还有什么不能治的病？”

1984年，临沂新华印刷厂一位年仅20多岁的青年职工在其他医院确认为肝癌，经过治疗后没有成效，医生已经明确地告知其家属：患者的病情已经无可救治，让家人准备后事。患者的妻子怀着“不抱什么希望的希望”找到刘启廷求治。刘启廷赶到患者处一看，已经严重腹水，肚如大鼓，双腿溃烂，呈现危象。在仔细察看并分析了病情后，他却出人意料地说：“这个病，我能治！”随即，他给患者开了几副药，嘱其如何服用等。患者服药后病情果然不再发展，得到缓解。刘启廷又不断给他调剂药方，让他连续服用。最后，奇迹果然出现了，小伙子基本恢复了健康，生存至今，已经30多年，还经常找刘启廷汇报情况，表示感谢。用同样的方法，刘启廷还挽救过其他多名同样患者的生命。

其二：“养生护正论”。

孔子曾经从孝道的角度说过：“人的身体包括头发皮肤，都是来源于父母，作为子女要懂得珍惜，不能轻易地毁伤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后代恪守孝道的开始。”这不是让人们不分立场是非，一味地保全生命，贪生怕死，而是要求一个人要懂得生命来之不易，敬重父母，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与健康，以期更好地存立于世，益于社会。但是，俗语讲，“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尤其是当代社会，在物质文明不断发达的同时，也导致很多人欲望膨胀，为了追求事业名利化、利益最大化、



带教查房

享受极致化，不惜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导致百病缠身，苦不堪言，后悔不已。针对这种状况，刘启廷站在悬壶济世的医道境界，鲜明地提出了“养生护正论”，强调“养生即保护生命，护正以提高防病能力。”他把古圣“上工治未病”“防治结合”的正确理念放在第一位，逢人便讲、苦口婆心地开导健康的人们和广大患者，要懂得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道理，时时注意调理阴阳，固护正气，畅达情志，调和气血，以维持人体功能的动态平衡，增强体质，抵御疾病侵袭。对于患者，他则把固本扶正贯穿于治疗全过程，辨证施治，促进其尽快祛除病痛，恢复健康，并向患者特别强调治愈后必须持之以恒地“养生护正”，以防止病情复发。

刘启廷坚持“养生护正”的观点，但又反对在养生上搞“神秘论”，告诫人们不要刻意地去寻求所谓的“独家秘笈”“传世绝方”，只要在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行止动静中加以留心注意即可。比如从少一点物欲，少一点不必要的思虑，乃至少喝一口酒、少吃一口饭、少用一点油盐、少熬一点夜等等做起，久而久之，必见成效。他的这些理念，让无数人特别是患者保持和恢复健康大受裨益。

刘启廷认真继承传统中医关于“养生护正”的理念与方法，又不拘泥于古人的实践与认识，善于动脑，精于研究，敢于创新。尤其是在与人们的健康联系最紧密、日常必须的“一日三餐”上，刘启廷坚持自古即被杏林推崇的“药食互补”观，认为这“诚为至稳至善之良方”。与此同时，针对传统食疗一般只是局限于对食物药理作用的认识与简单利用的不足，他坚持用长补短，潜心钻研，有新的见地，取得长足进步。例如，治疗过程中的“忌口”，一直是传统中医的一个重要理念与要求，但他则主张中医治病不必忌口过严。他认为人之所以发病乃因正气不足，而正气来源于精气，精气来源于水谷精微。若患者忌口过严或不注意饮食调节，必使精气更加缺乏，导致营养不良，缺少了战胜病患、恢复健康的“正能量”。因此，只要不与药理作用相克相反的食物，都可以食用。同时，他坚持“以药攻病者，去其大半，即以养正气而佐以祛邪”的观念，主张“药物治疗中病即可”，以科学合理的食疗为主。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他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独创了一系列食疗的新方精品，如适合糖尿病患者长期服用的“平衡系列营养食品”，解决了患者难于调节饮食的老大难问题。他还以绿茶为主要原料，配合其他中药，独创了“降脂稳压茶”，经过5年千余例临床验证，对高血脂、高血压疗效可靠而且显著，并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等等。所有这些，都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其三：善用经方，主张“一病一方通用”。

刘启廷推崇经典，善用经方。他认为经方是古人千百年来无数实践经验的结晶，配伍合理，疗效确切，屡试不爽，历久不衰，是古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继承提高的基础，发扬广大的途径。只要是同一病因病机，只要诊断准确，只要用方无误，在任何同病的患者身上，经方定然有效。同时，他又认为：病是发展变化的，在治疗过程中，有轻、有重，有合病、并病的变化，因此，要师古而不能泥古，使用经方绝不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照抄照搬；“君不变而臣可换”，在坚持基础方剂的基础上，应当做到知常达变，可以对症加减，灵活组方。这样，不但能收到治标之效，更能收到治本之功，从而使患者尽快得以痊愈。在此思想指导下，刘启廷从医、患两方面的迫切实际需要出发，针对常见病多发及各种疑难杂症，从浩如烟海的经方中经过反复对比筛选，殚精竭虑，总结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完整、系统、实用的治病之方，命名为《常见病一方通用经验方》，还编撰出版了《农村中医单验方500首》一书。这些验方，集中体现了他“一方通用”“方证结合”“专病专方专药”等理念与原则，组方严谨，好学易记，味少力足，临床使用方便及时。只要辨证准确，大多能收到疗效快、效果好、药到病除之功，而且能体现出中医药效显价廉的优势，为广大患



刘启廷拜会中医泰斗吕炳奎先生

者带来福祉。有一位病人，心绞痛反复发作，但是通过冠状动脉造影等检查却未见明显异常，住院治疗一个多月，症状不得改善，每晚必发心绞痛，结果又导致精神高度紧张，整日惊恐不安。主治医师束手无策，求助于刘启廷。刘启廷仔细为患者把脉观像，心中有数，遂处方治疗。患者服药3天后，心绞痛即得缓解，10天后症状基本消除，前后共服药21剂，花费不到200元，即得痊愈。患者欣喜不已，连声道谢。后随访3个多月，心绞痛一直未再发作。胃病是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而且症状复杂多样。刘启廷按照“一方通治”原则创制的“清胃化痰汤”，实现了很高的治愈率，得到业内广泛认可，成为使用频率较高的有效处方，已在基层卫生机构广泛推广使用，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折磨。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其四：“感冒病因无热论”。

感冒是人类最常见、最易发、最普遍的危害健康的呼吸道传染病。西医将其分为“伤风”与“流感”，而中医目前最为流行的是将分为“风寒”与“风热”感冒，而且制造出了多种治疗“两种类型”感冒的方药。但是，从临床实践上看，所谓“寒”“热”两种感冒很难明显区分，而且治疗不同感冒的药物也并不一定“对症”起效。对这一现象，刘启廷多年以来加以认真深入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流行”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早在《内经》上就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认识，古名医张介宾也曾提出“人之伤于寒而传于热者，寒胜则生热也，寒退则热退。”古之经典中并没有“热感冒”的记载，世人都说“我今天着凉感冒了”，没有哪个会说“我今天‘热’得感冒了。”据此，他鲜明地提出了“感冒病因无热”论。他认为感冒多在人的机体疲劳、感受风寒的情况下发病，风寒之邪无论其停留在表的时间长短、化热的时间快慢，其初起之时都兼有或轻或重的表寒症。若病人就诊时仔细询问，常可以发现凡在发病当日就诊的患者几乎都有“风寒在表”的症状。因此，刘启廷主张治疗感冒应着重于祛风散寒解表及恢复机体的正气，以“散寒透热、扶正祛邪”立法，以各相关有效药物组方，早用急服，一般1-3剂药就可以治愈。他以此理念、用此方法，治愈了近万例感冒患者，都是在短时间内除病康复，避免了现在很流行的“一个

小感冒、动辄半个月不见效”的现象与困惑。

正是在这些理念的促进下，刘启廷敢于实践，敢于创造，尤其是诊疗疑难杂症方面，更凸显出中医的独特优势，成为自己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绝活”。在全临沂市的中医系统甚至整个医疗界，疑难杂症患者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这个病，请您还是去找市中医院的刘先生诊疗一下吧！”这既是对他的推崇，也是对他的褒奖。就连北京、上海许多大城市和北到东北、南到广东的许多患者，也时常千里迢迢地慕名而来，向他求医问药。

刘启廷不仅善于动脑，而且善于动手，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等整理为书面成果，传之于世，广惠杏林。数十年来，他相继在国家、省级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36篇，编著出版医学专著14部，获得省、市级科技进步成果二、三等奖12项。

对刘启廷学术上的成就与水平，各级也都先后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褒奖。1991年，他被评为临沂地区科技拔尖人才。进入21世纪，他先后被评为山东省首批老中医药专家继承指导老师，全国第三批、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继承指导老师。他先后带教了5名继承人，3人已经晋升为主任中医师，两名副主任中医师，其中一名为在读博士生，一名为在读硕士生，都已经成长为全市中医医疗骨干和学科带头人。2011年，他又获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2015年3月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验收。

2014年，刘启廷入选第二届国医大师候选人名单，同年被评为山东省名老中医。

四、优良医德的弘扬者

《黄帝内经》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然“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数千年前，我们伟大的先祖黄帝就提出了“天地万物莫贵于人”的光辉人文思想，而且时刻在为民众深受疾病之苦而焦虑思虑，向医者提出了“为之奈何”的问题。作为一个优秀的中医工作者，刘启廷除以精湛精良的医术作出了圆满回答外，还在另一个方面即医德上，也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褒奖，亦如《黄帝内经》所言，恪守“病为本、工为标”的医患关系，待患者“如亲戚兄弟远近”。他常说：“哪一天见不到病人，我心里就不安就发急”，更是他时刻心系病人、忧患苍生的内心体现。他在医德上，突出表现出两点：

——“医病先安神，神安神自除”。中医特别强调病人的精神作用，历来有“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的提法。刘启廷十分注重患者的精神调养，提出“病人有信心，疾病好大半”。在接诊时，他强调首先要使病人精神安定；在治疗中，千方百计使病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他一贯坚持“换位思考”，从病人角度考虑问题，想病人之所想，解患者之所忧。他认为，病人对医生的言语、表情、动作都非常敏感，医生稍有不慎或者不周，就有可能给患者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其一言一行，必须慎之又慎。有一位病人在某医院胸透时，医生边看边皱了一下眉头，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明天拍片后再说”。结果这位患者误以为





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吓得一夜未眠，备受煎熬。第二天一早，他慕名找到刘启廷。刘启廷认真地看了一下患者的胸透报告单，原来是提示病人右肺上有一片阴影，建议拍片排除结核。他又详细询问了病人的症状，认为是明显的肺炎炎症。便告诉病人问题不大，只要积极治疗很快就会恢复健康，并给病人开了处方。病人心中一块巨石落地，心情顿时好转。结果只服了3天药后，症状明显减轻，5天后痊愈。刘启廷把现代医学中的心理学说同中医的“安神”说有机结合起来，对许多轻症病人和心因性情绪性疾病，常常采取精神安慰的疗法，辅以中药调治，很快就可以使之得以痊愈。即使是对待危重病人，他也坚持施以心理疏导，使之减轻思想负担与精神压力，积极配合治疗，以期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有一位女性患者，因境遇不遂，心情郁闷，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种精神病态，喜怒无常，头疼脑晕，彻夜不眠，萎靡不振，进而对生活失去信心，整日以泪洗面，悲观厌世，寻死觅活。虽经多方求治，反复检查，大量服药，花去上万元，但不见任何效果。家人十分焦急，多方打听后，求治于刘启廷。刘启廷仔细询问了病情后，认为患者是因“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百病悉去”。他采用“心病还需心药治”之法，对患者和颜细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阐明利害，耐心反复地做思想工作；同时，辅助以理气解郁之剂，终于使其思想情绪慢慢转变，最终豁然开朗，心胸大开，解除了精神上的压抑和心理上的“死结”，调治半月后恢复了正常。在临床上，不论诊治什么病人，刘启廷总是始终不断地给患者以精神安慰。许多病人说：“经过刘大夫一诊治，不但病看透了，而且精神上也不紧张了。”当看到众多愁眉苦目进门、喜笑颜开出院的患者时，刘启廷心中也充满了成就感与自豪感。

——“病人的信任是无价之宝。”随着医术的日臻精湛，名望的日益扩大，品牌价值的不断提升，慕名而来的患者越来越多，刘启廷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重。直到今天，他年逾八旬，仍然坚持在门诊、临床的最前线，每周坐诊6个工作日，只休息两个半天；平均每天接诊七八十名患者，最多时一天达到120多人。数十年来，经刘启廷诊治康复的病人不计其数，仅从1996年他对自己诊治的患者逐个建立治疗档案开始，至今已经记录在档的共计16万多人。悬壶济世，对刘启廷来说，确实是实至名归。

一个高龄老人，如果没有对患者亲人般的感情、菩萨般的仁心和火一样的工作热情，这么大的工作量，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在“品牌价值”越来越被社会重视的大环境下，院方考虑到他的高超医术，考虑到他付出的极大精力与体能，考虑到他的名望等，按照有关规定，多次主动提出要增加刘老的诊疗费。但是每到此时，他总是真诚感谢领导的关怀，婉言谢绝增费的决定。他说，“没有病就没医，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那么多的患者真诚而急切地来找我看病，恰恰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与鼓励。诊疗有价，但是患者的信任是无价的，能为一个患者解除病痛的满足与喜悦也是无价的。只要病人需要，我能干到哪天是哪天，能干到何时是何时！”

🔴 《苍山县志（1840—2010）》志稿专家评审会召开。6月13—14日，《苍山县志（1840—2010）》志稿专家评审会在兰陵县召开。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临沂市副市长赵爱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爱军对兰陵史志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要求，一是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原则。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在提高志书的著述性、思想性、资料性上狠下功夫，确保志书可读、可信、可用，经得起历史和社会的检验。作为省级重点志书，不但要成为全省的标杆，还要积极争创全国精品志书。二是切实做好志稿评审工作。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既要指出存在的问题，又要提出解决的方法，把好每一道关口，不放过任何细节，为修改完善奠定基础，指明方向。三是扎实做好评审后的修改工作。认真梳理归纳专家的意见建议，制定切实可行的修改方案，把修改任务分解落实好。同时，搞好工作条件保障，提高工作效率，集中时间和精力改好志稿。他还强调，临沂市和县（区）史志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省《规划纲要》精神，全面完成“三全”目标要求。

省史志办副主任翟世林、处长李刚、临沂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兰陵县委书记郑连胜、县长薛峰等领导和全省部分史志专家参加了会议。

🔴 临沂市史志办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会。4月27日，市史志办组织全体党员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传达学习中央、省、市各级“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文件精神，学习市委书记林峰海在全市“两学一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成立市史志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初步讨论了有关“实施方案”，对全市史志系统“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作了部署。

会上，市史志办党组书记、办公室主任朱海涛作了动员讲话，要求史志系统全体党员务必要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立足本职岗位、以身边的模范同志为榜样，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自己岗位上边学边做、边做边学，每天有进步有提高；要把“两学一做”与2016年重点工作相结合，务必做到学习业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 市史志办开展文明创建网络化建设。5月初，市史志办以“山东志愿服务网”为平台，成立了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学雷锋志愿服务支队。服务内容涵盖了文明创建、网络文明、社区服务、环境卫生、文明宣传等五个方面。

🔴 市史志办开展“结亲连心”入户走访。5月13日，按照市委部署和市直机关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深化“结亲连心”活动工作会议要求，市史志办组织10名党员干部，深入河东区郑旺镇宋庄村，在村两委成员和党员代表的带领下，分赴重点联系户家中开展入户走访调查，完成了2016年度党员干部与重点联系服务对象的首次对接。

🔴 市纪委监委驻一组副书记宋永峰到史志办作专题宣讲。5月18日，市纪委监委驻一组副书记宋永峰，就推动新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宣传学习和贯彻落实，到市史志办进行专题辅导宣讲。

🔴 临沂市地方史志业务培训班举办。5月19日—20日，临沂市地方史志业务培训班在市行政中心4楼会议室举办。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作动

员讲话。市史志办调研员伊永航，副主任段洪、于芹，副调研员王卫东等出席开班仪式。市史志办及各县区史志办从事志鉴编纂工作的相关人员共60余人参加培训。

🔴 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来临沂市考察交流。5月26日—27日，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陈波一行4人来临沂市考察交流，临沂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督查室主任秦鸿伟，临沂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副主任段洪陪同。

段洪对临沂市年鉴工作主要情况，特别是对《临沂年鉴》加快编纂进度、提升编纂质量的一些具体做法向客人作了详细介绍。双方还交换了最新的年鉴成果。陈波一行先后到莒南县、临沭县考察交流。

🔴 市史志办参加学习贯彻《准则》《条例》知识竞赛。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贯彻落实，普及党规党纪知识，促进党员廉洁自律，按照《关于在全市开展学习贯彻〈准则〉〈条例〉专题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要求，市纪委监委驻一组于6月8日在市直机关东会议中心第四会议室举办了学习贯彻《准则》《条例》知识竞赛。市史志办积极组织人员参加竞赛活动，取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

🔴 《郯城年鉴》2011—2014卷出版发行。

🔴 《临沭年鉴（2015）》出版发行。

🔴 莒南县史志办高级编审李祥琨当选“山东史志年度人物”。

🔴 我市各县区积极制定地方史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截止目前，已有平邑、河东、蒙阴3个县区制定完成了《地方史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并已由县区政府办公室文件印发。